

杜 光

第 33 辑

2012.6-9

文 存

(交流参考，非卖品)

目 录

举起先辈的火炬，争取祖国的自由民主	2
《论普世价值和〈08 宪章〉》内容简介	8
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开展	17
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26
1957 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36
6 月至 9 月微博选录	
生活履痕	43
往事杂忆	45
思想轨迹	48
网络故事	52
反垄断	54
房地产调控	56
读报随感	59
反右 55 周年	65
新“黑五类”	66
王薄事件	67

举起先辈的火炬，争取祖国的自由民主

——记一次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的茶叙

6 月 8 日下午，在北京的一些五七难友和难友子女，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茶叙，纪念 55 年前的“反右运动”。

（一）

对于难友和他们的子女来说，6 月 8 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55 年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策划、定题、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社论和文件，把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转变为对爱国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大镇压的反右运动。

长期以来，由于当局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个错误结论，压制民间对它进行探究研讨，禁止报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因而，反右运动和作为它的转折点的 6 月 8 日，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淡漠了、忘却了。但对于所有因被划为右派而沦为贱民的几十万难友家庭来说，6 月 8 日却没齿难忘。不过，很多难友只记得《这是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而对那个充满杀机、号令开杀的党内文件，却不甚了了。许多难友以为《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写的，记忆里把发生在 6 月 8 日这一天的两件事情——社论和党内文件，搅混在一起了。实际上，那个党内文件的作用，远远超过社论。因为社论虽有号召力，却没有约束性。而党内文件则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循的号令，无疑更为那些领导运动的干部所重视。毛泽东在同一天里既发社论，又写文件，双管齐下，彻底扭转了运动的方向，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打了下去，掀起了残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震慑住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而巩固了、加强了他的独裁统治。

因此，在 6 月 8 日这个日子里纪念反右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采取小规模茶叙的形式，是在国家安全部门严密的专制高压统治下的无奈之举。近几年来，国家安全部门似乎患了“会议过敏症”，只要听到有什么见面聚会的风声，哪怕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老朋友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也要出来干涉禁止。一方面是警告聚会地

点的餐馆或书店，以停水停电、甚至是停业整顿相威胁，迫使他们取消借用场所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对受邀参加聚会的人进行监控、约谈、喝茶、劝告。一部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专政机器，在这一类问题上运转得非常迅速、高效。因此，如果举行正式的会议，势必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干预，不胜其烦不用说，最后还是开不成会。为了避免这个不幸的前景，我们不得不采取小规模的茶叙的形式，来实现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的心愿。

参与这次茶叙的，有两位当年的罹难者，5 位难友的女儿，还有两位关心这一事件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因为接到邀请书，受邀参加 10 日将在香港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研讨会，这几天一直受到警方的干扰，劝告他不要参加会议，并且对他实行 24 小时监控。来参加茶叙前，他说要出门看朋友，警方说，我们可以用车子送你去。为了不至于连累其他朋友，他把出行的目的地说成另一个地方，下车后摆脱了警方的跟踪，再搭公共汽车来和朋友们见面。这个插曲，为这次小小的茶叙添加了谈资笑料，倒也有趣。

（二）

在茶叙漫谈中，大家一起回忆了 55 年前那个由民主运动转变为残酷镇压的可悲时刻。在 6 月 8 日以前，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帮助党整风的诱导下，对中共建政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批评建议。特别是以北大“五一九”为开端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的口号，提出“为民主而斗争”，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对镇反、肃反、反胡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提出尖锐批评，直接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如认为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至于在大学以外的社会上，很少有人直接提出民主自由的口号，多数是对具体工作中的缺陷，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对建立未久的专制政体的批评和指责，本身就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所以，在 6 月 8 日以前，这个社会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反专制争自由的民主运动。6 月 8 日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在所有学校、机

关、企业以至学术研究单位，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独裁者凭借专制统治机器的强大权力体系，对民主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毫无招架之功，结果，无数知识分子（一说 55 万余人，一说 300 余万人），被淹没在“杀人不见血”的汪洋大海里。这就是反右运动——专制统治者的盛宴，知识分子的劫难。

茶叙中还谈到，毛泽东在运动开始时发动整风，可能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他在 1956 年就提出要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目标其实是党内最有可能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1953 年他成立计划委员会，把高岗从东北调来当主任，就是让高岗来分周恩来的权。他多次找高岗密谈，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让他到东北去调查刘少奇的问题。高岗信以为真，就召开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矛头直指周恩来；又利用饶漱石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批判安子文，矛头指向刘少奇。他还找一些领导人谈话，表示要拱倒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分别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毛泽东权衡厉害，一翻脸就搞了个“高饶反党集团”，而对刘少奇、周恩来，仍然心怀警惕。1956 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定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章上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设立名誉主席，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刘周等人为削弱他的独裁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发动整风，可以把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不满情绪，引向某些领导人，借助党员和社会群众的力量，实现他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

另一方面，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意识到国内的社会危机，他特别注意知识分子动态。因为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摧毁，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最有威胁的社会阶层。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把我们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以，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对部分知识分子进行打击，以震慑整个知识阶层，消除对独裁统治的威胁，就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了。

为了化解社会上骚乱爆发的各种矛盾，发动广大民众和党员积极

投入即将开展的政治运动，也为了诱使知识分子大胆“暴露”，毛泽东在1957年2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且一再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于是，各部门、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都开始了整风的大动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整风本来只是党内的运动，但动员的对象却主要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如大专院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机构等等。出于毛泽东的意外，党内外知识分子被动员起来后，矛头所向却不是刘周等人的右倾和工作失误，而是他主持推行的反胡风、三大改造、统购统销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直接针对他个人的批评。面对这个趋势，他不得不放弃利用整风来打击党内对手的打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反击知识分子的批评。他把邓小平推上第一线，任命他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

毛泽东后来把反右运动解释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他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光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行，还要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运动就是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反右运动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当然，把反右运动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反右运动确定无疑地建立并巩固的，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

（三）

参加茶叙的朋友中有五位是当年右派的子女，交谈时提到了“右二代”。有的朋友不赞成这个称呼，认为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还有“星二代”，都带有讽刺和贬斥的意味，仿佛都是一些仗恃父母的权力和财富而睥睨当代、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和他们完全不同，我们的父母当年因为反专制争民主而被打成右派，沦

为贱民，虽然受了许多苦，并且连累了我们全家，但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光荣的，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也引以为豪。我们长期生活在贱民家庭里，在苦难中成长，深知自由民主平等的可贵，我们要接过父母的火炬，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广大，不能让“右二代”这个称呼玷污了我们。

有的右派儿女说：反右运动已经 55 年了，当局至今还坚持“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个荒唐的结论，不道歉，不赔偿。近几年来，许多右派老人不断上书，发公开信，写文章，到省会和北京上访，对当权者恳求哀告，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希望他们实事求是地面对事实，但都没有感动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就是想把现在还活着的这些原来的右派分子都拖死了，就可以不了了之。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有责任把父母留下的担子挑起来，一方面，深入批毛批邓，揭露他们违反宪法、违反人性理性的狰狞面貌，清算他们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严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当局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承认错误，向我们的父母道歉，赔偿受迫害二十多年的损失，并且妥善解决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果我们这一代达不到目的，还有第三代。现在已经有第三代英勇上阵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有的朋友还谈到，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改革反改革、启蒙反启蒙、维权反维权。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形式，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一点一滴、一砖一瓦的作用。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启蒙，由于当局掩盖历史真相，禁止讨论历史问题，很多老人，甚至很多中青年，至今仍然处在受蒙蔽、被欺骗的蒙昧状态。如有的人在毛派的蛊惑下，认为还是毛泽东的时代比现在好。这就需要大量说理透彻的文章，揭露历史真相，分析批判那些带有极大欺骗性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和在香港出版的，有许多高质量的文章和专著，在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中，我们至少可以做个“二传手”，把这些好书好文章下载复印，广为散发，使更多的民众受到启蒙教育。

（四）

茶叙漫谈时，有的朋友还对我最近出版的《回归民主——和吴邦

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作了评说。他们说，长期以来，我们根据切身的感受，对过去接受的一些理论观念，产生了许多怀疑，也进行了反思，又从互联网上读到了大量文章，得到了很多启发，思想认识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问题太多，由于当局推行实际上是愚民政策的舆论导向，广大民众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处于蒙昧状态，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或者换一句话说，需要进行启蒙性的教育。《回归民主》的出版，正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可以在社会上发挥启蒙教育的作用。这本书对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传统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清算，廓清了许多习以为常的糊涂观念，特别是对于像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重大问题，既从理论上揭露了它们的谬误，又从实践上指出了它们的危害，特别是它们阻碍改革开放的有害作用。十五篇文章和鲍彤的序言，说理明确，论证透彻，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推广《回归民主》，宣传这本书里的理论思想，就是推进启蒙运动和改革开放，所以都乐于为推广此书出力。

但推广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回归民主》是不被当局认可的出版物。此书原名《评“八确立”、“五不搞”》，有简体字的试印本，在香港正式出版繁体字版时，书名改为《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它刚出版就在大陆被列入禁书黑名单。少量逾越海关的严格检查而流入大陆的书，虽然经过复印，仍然不能上市或邮寄，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传播的难度，阻碍了它的扩散。参加茶叙的几位朋友最近奔波于京华道上，分送复印的《回归民主》，十分辛苦，但他们仍为自己能以这种形式促进启蒙运动而感到自豪，把自己称为“民主义工”、“启蒙义工”愿意继续做《回归民主》的“二传手”。我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五）

朋友们还对当前时局和某些社会问题，进行了交谈，大家无拘无束地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有坦率的陈说，也有剴切的规劝；相互支持，彼此勉励。已经到六点钟了，茶叙在舒畅的、和谐的气氛里宣告结束。

同参与茶叙的朋友们握手告别后，我带着大家的祝福和期盼回家。

走出几十米后，我回头遥望，几位五七难友的子夜还在路那边热烈交谈。一种异样亲切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这些朋友是不幸的一代，平庸的一代，但同时也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由于他们青少年时代成长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家庭里，被剥夺了应该享有的社会资源，良好的教育与他们无缘，因而，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识，他们都不如 55 年前的父母辈。但是，网络时代的信息涌流，民间民主运动的持续高涨，却使他们获得了父母辈所不具备的条件。他们不但对于现代社会的见解远胜于父母，而且所作所为也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比他们的父母作出更大的贡献。北大“五一九”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但他们当年所举起的自由民主的火炬，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扑灭了。这些难友子女的历史任务，就是重新点燃先辈的火炬，高高举起，照亮争取自由民主的征途，驱除一切黑暗，迎接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

在将要来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里，在改革的高潮、启蒙的高潮、维权的高潮里，这些右派儿女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怀着颇为乐观的心情，轻快地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2012 年 6 月 30 日

《论普世价值和〈08 宪章〉》内容简介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说，一是关于《08 宪章》的论说，分别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排。

第一部分共有 9 篇文章，其中，主要从理论上阐述普世价值的有两篇：《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是我 2008 年 8 月 31 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这个发言里，我首先说明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推翻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

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实践普世价值。我又指出：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怜悯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仁爱、平等、诚信、公平等等。接着，我还介绍了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马克思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要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就需要找到符合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共同价值的共同目标，那就是自由，这从他把未来社会设想为“自由人联合体”就可以了解。马克思还认为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人民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解放全人类，就是使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全人类都得到实现。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是我在同年 11 月应《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的一位编辑之约而写的。他们准备在子刊上开辟专栏，发表关于普世价值的各种不同观点。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表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所以欣然从命，很快就写出了这篇文章。但文章发去后，好几个月没有回音，听说是被高层叫停。于是，在媒体上就只有批判普世价值的讨伐之声，正面论述的文章基本上全被挡在报刊之外。我的这篇文章，就只好送到网上去了。

我的这篇文章首先说明什么是普世价值：“价值本来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物品的有用性的判断，后来扩展到社会的其它领域，泛指所有涉及人们生活 and 利益的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即所谓价值判断。普世价值，顾名思义，是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

在关于普世价值的大讨论中，不少文章都集中在自由、民主、人

权等问题上，为什么？我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呼求（《历史的先声》一书对此有着详尽的记录），再到近几年朝野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以对历史的回顾来回答这个问题。针对普世价值反对者的一些论据，我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说明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宽容、和平、仁爱这些理念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和需要的普世价值，但要真正在社会上实现，并且形成制度，为全世界所承认、接受、遵守，却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制约。在这些制约因素里，最重要的是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内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切公民权利的经济基础。只有社会成员都有了财产所有权，人人都成为有产者，普世价值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完满的实现。

《诋毁民主自由为哪般？》和《从“先有蛋后有鸡”说到普世价值》是两篇“读报随感”。前一篇针对 2008 年 10 月 22 日《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峰”的文章《拳头里的“民主”》，指斥作者的歪曲事实、强词夺理，同时揭露了毛左派的理论秘密：他们反对民主自由，就因为民主自由是反对专制体制的强大武器。所以，批判普世价值也好，诋毁民主自由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护现行的专制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后一篇从《北京晚报》11 月 18 日的一篇报道说起，说明“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是通过逻辑上的偷换概念才完成的。在理论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常看到运用这种逻辑方法进行诡辩的事例。如在最近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有些人通过偷换概念，把普世价值等同于、局限于西方的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符合我国国情为理由，拒绝普世价值。他们借口人的阶级性，否定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这些带有浓厚片面性的见解，使他们无法正确认识普世价值。

《哪里来的“赵紫阳集团”？》写于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掀起不久，有人把批驳陈奎元的文章说成是“赵紫阳集团的大反攻”，认为“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并且把温家宝封为“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批判矛头直指温家宝。这就使他们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居心昭然若揭。因为赵紫阳以推动改革而为人所共知。1987 年初，当反改革的政治势力趁着拱倒胡耀邦的余威，发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为名的反改革高潮时，刚担任总书记职务不久的赵紫阳就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把反自由化严格限制在“正面教育”的范围内，扑灭了反改革的熊熊烈火。接着，他在同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把党政分开作为改革政治体制的首要任务，实际上为逐步转变一党专政的体制格局，创造最基本的条件。赵紫阳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捍卫者，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他去世三年多后，居然还有人念念不忘对他的敌视，把主张改革最积极的政治力量贬斥为“赵紫阳集团”，这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些人反对改革的险恶用心。这篇文章除了介绍被赵紫阳粉碎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外，对邓小平南巡讲话前的第二次反改革高潮，和近年以反普世价值为标记的第三次反改革高潮，也做了简要的描画。

《实现普世价值是人性的复归》是我2008年12月27日在“血液安全与艾滋病病人权利保护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我说：“普世价值作为理论概念，指的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因而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价值理念。”它是“普照全球的阳光，滋润大地的雨露。爱滋病患者由于比起普通公民更不自由、更不平等，尊严更不受尊重，权利更得不到保护，所以更需要普世价值的光照雨泽。”“爱滋病患者备受歧视的事实，说明我们非常需要普世价值的启蒙。”“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推行普世价值的过程，也是走向人类解放、人性复归的过程。实现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的解放，人性的复归。”

《我为什么要推崇普世价值？》是我给一位《炎黄春秋》读者的回信。2009年1月，《炎黄春秋》在当年第1期上发表了《普世价值：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后，有一位读者来信，提出5点质疑。我考虑到他提的这些问题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决定逐题作答，并在网上披露。本文是第三封回信。后因这位读者不满意我的回信方式，原来计划要写的另两封回信就没有再写。

在这封长达一万多字的回信里，我分析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有没有“在指导思想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同时，对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否取得“重大成绩”，指导思想上的谬误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我首先指出，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

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它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接着，我用较多的篇幅逐一论证了这四个“化”的意义。在最后的结语中，我说：就这“四化”来说，市场、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实现普世价值，指导思想上有没有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是改革是否能够达到“四化”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是对权贵集团和毛左派联合抹黑温家宝的反击。近几年来，反改革派不遗余力地攻击温家宝，甚至污辱诽谤，把他形容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招致这一切的根由，无非因为温家宝赞同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一类的观点，大声疾呼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使他成为反改革派的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不但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含沙射影的批判文章，在网络上肆意攻讦诽谤，而且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在官方的媒体上拒不发表温家宝的讲话，或者删除讲话里涉及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不让广大民众听到他的声音。我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背景，解剖了形成批温大合唱的三股社会力量的不同心态，呼吁一切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密切合作，“朝野改革力量的团结和合作，最终将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把中国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轨道。”

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数朋友认同我的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为此，我写了《回应〈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引起的波澜》，有层次地说明我对改革路径和发展前景的思考逻辑。其中还介绍了我对最高权力结构中的三种政治力量的简要剖析。

就在写这篇内容简介的间隙里，我在网上读到两件倒温奇文，一件是马宾等7月15日发布的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呼吁书，要求罢免温家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据说签署者有1644人。另一件是有个“毛泽东思想联谊会‘送瘟神’总部”发布

一号动员令，提出“还我好公仆薄熙来”，“打倒卖国贼温家宝”，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为营救薄熙来谷开来而绝食或静坐，号召举行万人以上的游行示威。这说明那些反改革反普世价值的势力正在组织“最后的斗争”。我把它补记在这里，供读者一笑之后深思。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共有 6 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对《08 宪章》的解读。我的基本观点就凝聚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上：《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

在《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里，我说明《08 宪章》立场温和，持论理性，语气平缓，态度和解。它认为我国目前“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以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暴力冲突”，应该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为此，它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既对现有体制进行深刻的批判、又设计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完整路线图，字里行间，洋溢着和平改革现有体制的愿望。这是一份理性的宣言，同时，也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理性、和解、合作、非暴力，应该是我们改造社会的最佳选择。接着，我论证了《08 宪章》其实也是执政党摆脱目前困境的最佳选择：首先，它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其次，它提出的价值理念和基本主张，为执政党提供了总结经验教训的参照系；再次，它的和解合作精神是消解社会暴戾之气的清醒剂；最后，“08 宪章”可以成为执政党清除污垢、完善自身的契机。

在这篇文章里，我还对《08 宪章》提出的 19 条主张中几个影响较大的问题，包括修改宪法、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和“联邦共和国”等，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最后指出：“《08 宪章》所提出的目标必将实现，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什么时候实现，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将取决于人民的觉悟和当政者的觉醒。只要人民从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影响和毛左派的蛊惑下解放出来，只要当权者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个人既得利益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并且采取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态度，《08 宪章》就有逐步实现的可能。

《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是我为纪念《08 宪章》发

表一周年而写的。我在文中分析了《08 宪章》出现的背景，并且说明：《08 宪章》重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价值理念，提出了 19 条基本主张，实际上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蓝图。中共十三大曾提出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承诺，1989 年后却完全抛弃了，《08 宪章》只不过把它引向更为彻底、更为完备的目标罢了。它为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推进改革、完善自身，从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明确无误的目标。同时，《08 宪章》也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它尖锐地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鲜明地展示实现宪政民主的决心，但始终坚持善意、理性、和解、非暴力的原则立场；它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和平对话的范例，具有长远的示范意义。《零八宪章》记录着人们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成果，凝结着大众对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心愿和期待。一切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家，都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不能等闲视之。

《对自由理念、自由权利的误读和自由宪草的真谛》是我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批评《08 宪章》所写的评论。社科院的许多研究人员，从他们的院长陈奎元开始，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了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对他们那些用陈词滥调堆砌起来的垃圾文章，我向来不屑一顾。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虽然怀有学术良知和爱国情怀，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对《08 宪章》缺乏理解，提出一些责难，这些真诚的误读应该受到理性的回应。我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与“零八宪章”对话》（以下简称《对话》）而写的，这个对话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人权等理念的分析与批判。我在文中说，自由是《08 宪章》的真谛，只有正确理解自由，才能读懂《08 宪章》。因此，我从自由的概念说起，指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既是普世人所共有的自然权利，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无害于他人为原则，由法律加以规范。这是自由的本质特征，许多对自由的误解、歪曲以至无端攻击，都源于对这个本质特征缺乏全面的了解。接着，我从《对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自由观。《对话》认为：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的，在目前还属于比较合理的部分，一是无神论思想，二是强调对下层民众的关注。我在点出这一观点的虚妄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比较实用”和“合

理”的部分，恰恰是他的自由观，因为这是对那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批判普世价值的政客和帮闲的当头棒喝。马克思的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零八宪章》的精神是一致的。

《对话》作者对结社、集会、言论和宗教信仰等公民权利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认为结社“从来也没有禁止过”，因而“结社自由是不必要的”；“集会自由”除了保障学术会议、听证会自由有积极意义以外，就剩下消极意义了，所以集会自由是要不得的；至于“言论自由”，她非常赞同“学术自由”，但“言论自由”不能完全开禁；“‘宗教自由’是与‘科学与民主’观念相对立的”，“所以，把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放到宪法中，显然会与这种社会前进的方向相左”，“等于维护了封建迷信，是开历史倒车。”《对话》作者虽然反对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除“学术自由”以外的思想自由，但又肯定普世价值，在《给胡锦涛主席的第三封信》里明确表示：“总之，批判普世价值是愚蠢的——等于与全世界为敌，与科学与文明为敌，更不能采取镇压的方式。”这个矛盾大概就是《对话》许多误读的根由吧。

在第二部分里，我还编进了三篇就刘晓波被捕、判刑、得奖三事所写的文章。第一篇是2009年6月24日获悉刘晓波被捕后写的七八百字的短文《强烈抗议对刘晓波的新迫害》，我认为，给“08宪章”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是非常荒唐的。“08宪章”是一个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宣言，它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九点基本主张，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同时，也为执政党提供了改善自身的良好机会。只有满怀爱国之心而又才智洋溢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如此切中时弊的社会改革方案。把刘晓波这样的智者爱国者诬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最典型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最大教训是把忠贞的爱国者当作危害国家的敌人。造成多少冤假错案，多少社会精英惨遭残害，这些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如果今天还要继续这种危害社会、戕贼民族的罪恶行径，把持有不同政见的智者爱国者视为仇讎，肆意迫害，就必然会搞得天怨人怒，以致真的发生“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变，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们！

第二篇写于同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晓波

有期徒刑 11 年之后，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判决，可耻的判决。说它愚蠢，因为《08 宪章》是一个促进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文献。刘晓波则是一位胸怀祖国，忧国忧民，为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繁荣昌盛而不懈思考、呕心沥血的爱国者。现在却因为起草《08 宪章》而被判刑，投入监狱。是非颠倒，多么愚蠢！说它可耻，是因为法院判处刘晓波的罪名，既违宪非法，也逆情悖理。判决书加在刘晓波头上的罪名，一是诽谤造谣，一是煽动颠覆。我在文中引用判决书的原文，指出，每一个公民都有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的权利，你不能因为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说他是“造谣诽谤”。至于煽动颠覆，在刘晓波的文章和《零八宪章》里，有哪一行哪一句是“煽动”别人采取行动，去摧毁、推翻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现政权早就提出的主张，《08 宪章》不过描绘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图景，怎么就成了“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了呢？

最后一篇是《让“我没有敌人”的旗帜高高飘扬》。2010 年 12 月 10 日，在奥斯陆举行 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获奖者刘晓波被关在牢狱里不能与会，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在会上朗诵了他一年前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同一天举办的和平奖主题展览，也以“我没有敌人”为名。作为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的价值理念，“我没有敌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我没有敌人”应该成为当代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同信守的价值理念。在变专制主义为民主主义的改革过程中，任何个人，包括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丑类，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巩固独裁统治而采用的伎俩。“敌人”是专制思维的产物，是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没有敌人”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它将指引我们沿着理性的大道，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除了关于普世价值和《08 宪章》的文章外，我还把《08 宪章》作为附录编入本书。因为《08 宪章》在网上发布后，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密封锁，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都没有机会读到它的全文。本书第二部分既然论说《08 宪章》，就不能不把它的全貌介绍给读者。另外，附录还增加了两封上送中共中央的信，一封是摘要，一封是全文。两

信都没有上网，只收在 2009 年的最后一辑《杜光文存》里，因与《08 宪章》有关，所以也编在这里。

2012 年 8 月 10 日

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开展 ——《论普世价值和〈08 宪章〉》一书前言

（一）编印这本小册子的缘起

为什么要把我这几年写的关于普世价值和《08 宪章》的文章编成这本小册子？我是这样思考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有可能进入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它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我们摆脱“猫论”、“摸论”的因袭传统，以符合于历史规律的理念为指导，树立明确的目标和路径。因此，为了稳妥地、健康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准备过程，首先是理论上、观念上的解放与转变过程。贯穿这个过程的，不应该是传统僵化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排斥异己的舆论一律，而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讨论。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每个公民都有权发言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期望。在全民大讨论、大启蒙的基础上，确立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理念和目标。我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参加和推动这个大讨论而编的。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普世价值和《08 宪章》这两个主题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以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近代世界的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观念，是反专制、反垄断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要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就离不开普世价值。至于《08 宪章》，它所提出的 6 条理念和 19 项主张，等于是描画了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草图，你说它粗糙也好，说它不合时宜也好，至少它提出了一个可供思索、讨论、参考的资料。所以我认为，把有关普世价值和《08 宪章》文章编在一起印发，将会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妥而健康的开展。

我关注普世价值，还同近几年的社会理论思想动向有关。从 2008 年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和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批判、讨伐普世价值的

高潮。普世价值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概念，指的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符合于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要的价值观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普世价值，是否可以承认和接受普世价值，它对现阶段的中国的社会发展有没有实际意义，这些本来都是可以从容讨论的问题。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官方和半官方的报刊都只许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却不许肯定、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出现。社会舆论呈现出一面倒的态势。

在审视那些来势汹汹地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时，我发现它们的矛头所向，主要还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而是作为这个概念内涵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甚至也不是这些价值理念本身，而是如何依据这些理念来设计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个现象使我理解：他们批判普世价值的内在动力和隐秘目标，就在于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理念，来改革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说白了，批判普世价值，就是为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出现这个趋势是可以理解的，近几年来，朝野改革派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使权贵豪强和毛左等反改革派感受到正在迫近的威胁，于是就有了批判普世价值、批判自由民主、批判温家宝的的舆论讨伐高潮。我编的这本小册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批判高潮的回应。

（二）政治生态的恶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中国共产党早在 25 年前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就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迫切任务列入党的日程。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报告提出了七项改革措施，第一项就是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遗憾的是，经过“8964”大镇压，党内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同时也就摧毁了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三十年来，虽然从十四大到十七大，每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但内容多属空洞的承诺，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等。而十三大提出的“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党政职能分开”，却不再出现于党的文献。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把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为此，首先必须党政分开，还权于政，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罪恶，追根溯源，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到处滥用。十三大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推行的关键，的确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只有实现党政分开，还权于政，杜绝以党代政，才能建立起对这种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制度。

即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全党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就是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一年多来，网上发表了不少对十八大提出建议和期望的文章，多数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十三大政治报告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相信，这个判断在25年后的今天依旧有效，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已经成熟，而且更为迫切。但是，与25年前比较，随着政治生态的恶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难度显著增加，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共中央在十三大以前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充分的酝酿。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全党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十三大把它列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6年，邓小平又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中央组织一百余位专家学者，经过近两年的讨论研究，才有十三大的改革规划。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时移境迁，这个条件早已消失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准备，如何开展，推行路线的选择，近期目标和发展远景等等，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安排。

其次，十三大召开的1987年，处在相对自由民主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朝野认识比较一致。赵紫阳在十三大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集中反映了执政党对全面改革的愿

望和信心；在民间，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表现出广大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热诚。这个条件在“8964”后就不存在了。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裂。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更是严重对抗，不可调和。

再次，反改革的力量在十三大前还非常薄弱，1987年初胡耀邦辞职后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主要是由一些失意官僚掀起的，没有多少群众基础，只在少数文革影响犹在的机关里引起某些反响，赵紫阳的一个讲话就把它摧毁了。现在就大不相同了，由于既得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形成，在执政党内外，从最高领导机关到基层组织，都有着强大的反改革势力。他们利用经济体制改革，攫取国家资财，侵害民众利益，发财暴富，依仗的是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政治权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要限制和监督各种政治权力，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顽强反抗。

第四，主要由失意政客和文革余孽构成的毛左派，近几年影响迅速扩大，大大增强了反改革的社会力量。由于权贵豪强持续加强对民众的掠夺和压迫，加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都落进他们的口袋，以致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群发性事件逐年递增，广大群众对现实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这就使毛左派获得了扩大影响的大好机会。他们一方面把当代社会上的种种弊端，都归罪于改革开放；同时渲染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和清廉，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成就，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的诽谤加欺骗，吸引了大量对历史不甚了了的中青年，构成反改革的强大势力。

第五，十三大提出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国社会已经经过几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人们和睦相处，比较平等自由，对改革的未来普遍怀有美好的憧憬。政治权力虽然缺乏制度性的制约与监督，但总的说来，权力的运行还是比较克制的。不过，由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许多因滥用权力而引发的不良现象已经不断出现，如依仗特权走私贩私，倒卖批条；官商勾结，贪污受贿；党委干预司法，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对私人企业无理刁难，敲诈勒索；等等。实现党政分开，正是有效地遏止权力滥用的第一步。二十多年来，由于十三大的政改方案被置之高阁，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

横行无阻，许多不良现象恶性发展，导致今天的两极分化，官民对抗，社会分裂，危机重重。改革政治体制、制约与监督权力运行，已经成为眼下最严重最迫切的任务。

第六，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八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相对自由宽松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的干部和群众，自觉地投入到反思和再学习的热潮中，特别是大量翻译引进的西方学术著作，打开了人们久被禁锢的头脑，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过去，重新认识未来。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政治体制改革准备了牢靠而宽广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8964”大镇压，把经过“十年教训”培育起来的朝野改革力量消灭殆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官方报刊和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即使这20年的历次中共代表大会都在政治报告里写上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有所论述，表明它还列在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上，但在会后连篇累牍的宣传里，却难觅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20多年的蓄意掩盖，抹煞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人思想里的存在，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少了，人们热衷于追逐物质利益。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应有的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七，但现阶段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十三大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就是互联网的普及。这是现代科学赐给世人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礼物，一座肥沃丰饶、浩瀚辽阔的百花园，它无所不有，无远弗届，而且威力无穷。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已经有五亿以上网民。我们不妨设想，五亿多人可以在那里欣赏各种各样的思想成果和文化产品，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同时也可以畅叙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见解，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舞台，一所多么宏伟的学校。这里既有孕育真理的苗床，也有滋长谬论的园地，人们在比较中认识真理，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进步的趋向。在互联网的培育下，新一代青年正在健康成长，他们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基础。

第八，互联网还将成为连接朝野改革派的纽带，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单向的运动过程，而应该是朝野合作、上下互动的成果。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就是最好的说明。二十多年来，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冲突不断加剧，

朝野之间已经完全丧失了合作互动的条件。民间强烈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得不到当局的正式回应；在朝改革派的改革主张，也得不到民间的有效支持。在互联网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的情况下，这是很难避免的。但互联网功能的不断扩大，将会改变这个局面。例如，我们可以从一年多来官方微博的陆续出现，窥测微博作为沟通朝野、协调官民的工具的可能，也看到了上下合作、共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

前面所胪列的二十多年来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更加困难，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日益高涨的呼声和成堆的难题，许多仁人志士各抒所见，提出各种不同的政改主张；也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借着批判普世价值的名义，把政改的呼声淹没在丑化妖魔化的唾沫和反帝反西化的喧闹之中。徐景安认为：“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我十分赞成。从诸多反普世价值的文章来看，这个判断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政治体制与反对改革政治体制之争。肯定还是否定普世价值，是改革与反改革的试金石，也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试金石。

（三）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假改革派素描

按照对改革的态度来划分，除了一些对改革漠不关心的群体以外，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反改革派，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教义派，所以也被称为毛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改革开放离开了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处心积虑加以阻挠。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就是他们对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最初反抗。这个小小的政治运动只推动了二十多天就被胡耀邦制止了。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他们弹冠相庆，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开会写文章，把改革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签。中宣部甚至发布正式文件，宣告反自由化是1987年全党的中心工作。赵紫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一个大会报告就浇灭了这场反改革的熊熊大火。“8964”后，朝野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接着发生苏东事变，他们又把改革同和平演变挂起钩来，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口号，有些会议明批赵紫阳，暗批邓小平。这个

动向迫使邓小平离京南下，大讲改革，才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反改革的声浪随之消退。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只能以发布几个万言书的形式来表达反改革的心意。进入新世纪后，他们又从上书言事转向有组织的活动，先后成立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共产）党。前者成立于 2008 年，以上海为基地，公然提出要推翻共产党现在的领导集团。2010 年他们兴冲冲地跑到重庆去开代表大会，要推举毛新宇当他们的主席，薄熙来当总书记，不想反被薄熙来抓了起来，由此一蹶不振，只留下一些谈资笑料。后者成立于 2009 年，基地在北京。他们比较策略，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要“同心协力帮助中共”，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三年多来，他们不断发布“建言献策函”，宣称国庆 60 周年天安门前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中共接受他们的建议才安排的。

第二类是假改革派，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权贵豪强，和依附他们、为他们服务的御用知识分子。他们不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他们正是这个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进了他们的口袋。但他们反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政企分开，切断企业连接权力机关的脐带，意味着民营企业向垄断经济进军，把垄断企业纳入市场经济，这个趋向势必削弱权贵资产阶级安身立命、既得利益的经济基础。所以一些突破垄断的政策，如两个“36 条”，就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反对用民主自由的理念来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想用一些不触动现有政治体制的小修小补来维持现状。近几年来朝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渐高，引起了他们的警觉，适逢《南方都市报》关于四川灾情的报道里提到普世价值，被司马南抓住非难，进而引动了通过批判普世价值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

从批判普世价值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些批判者的拙劣手法和险恶用心。《南方都市报》在救灾的报道中提到政府对普世价值的承诺，指的是“以人为本”、赈灾济困这些民族传统里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这些批判者却把它偷换成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进而又说成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人权，引申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

谋，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者则是帝国主义的奸细、叛徒、卖国贼。

近几年来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趋向，就是反改革派和假改革派的协力合作。这两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虽然目标各异，一个要维持现状，一个要回归毛泽东时代，但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焦点上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语言。加上一个掌握权力却缺乏群众基础，另一个则有相当多民众的认可拥护却没有权力，两者联合正好优势互补。从“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出现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合作的端倪。工人（共产）党成立三年多来，发布过好几十份宣言、声明、建言等等，召开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受到干扰、追究，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最明显的相互合作和相互渗透表现在重庆的“唱红”和“重庆模式”上，这是两派合流的杰作。在毛左派的重要喉舌“乌有之乡”上，开辟有热点专题“重庆经验”的专栏，据他们自己去年6月的统计，收纳吹捧重庆模式、重庆经验的文章，竟有1184篇之多。今年2月发生的意外事件，打破了这两类反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扫除了政改的部分障碍，但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实力犹在，反政改的统一战线没有受到破坏，这仍然是政改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

第三类是改革派，就是民主派。因为他们的改革主张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不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而是要以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他们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民主传统的继承者，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履践者。远的如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就不说了，在六十多年的当代史中，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1976年的“四五”民主运动，都是以高扬民主自由的旗帜为特征的。文革后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平反冤假错案，西单民主墙，真理标准大讨论，承认商品经济等等，都是在特定范围内对专制垄断体制的突破，具有民主主义的革命意义。这些民主主义的动态和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孕育出富有民主意识的一代新人。1986年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兴起的民主运动，就是他们从觉醒到行动的表现，可惜，这个运动还没有进入高潮就被制止了，并且成为胡耀邦下台的导火索。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再次激起了人们反专制争民主的热情和勇气，于是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八九民运的主要诉求是反腐败和改

革政治体制，运动遭镇压后，腐败愈演愈烈，政改被束之高阁，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则在随后的清查运动中受到全面的摧残。此后的十多年是民主诉求和政改呼声趋于低潮的时期，民主自由之星陨落了，代之而兴的是争夺财富的厮杀，在京城和各地，只有少数书刊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民主之光，传播着理性和希望。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窒息的社会空间有了新鲜的氧气，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和科学真理的探讨，唤起了人们思想上潜在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文化和舆论的严酷统制，政法机器黑社会化，占地强拆，暴力维稳，官商勾结，官匪一家，迫害异见者，等等，使人们意识到政治权力得不到制约与监督的专制体制，是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因而加强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和期望。这就使改革派即民主派获得了日益扩大的社会基础。尽管他们的理论主张到处被封锁，无法通过公开的报刊书籍来传播；尽管他们的先锋人物经常被监控、盯梢、殴打、拘捕，甚至判刑入狱；但对民主理念和改革前景的自信却使他们成为当代最具活力、最有前途的群体。

（四）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

前面我简要地分析了中共十三大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描画出对政改持有不同态度的三类群体的特点，意在说明，在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被搁置 25 年后的今天，再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何等困难。25 年来，一方面是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持续增强；同时，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矛盾不断加深，危机日益深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无限扩大，随处滥用，归根到底在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专制政体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和难题的长期积累，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只有及早改革政治体制，才能避免巨大的社会灾难。但政治体制改革之难度，又已经到了无所措手足的地步，不论从哪里下手，都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因而遭到激烈的对抗，反而引起新的矛盾。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急需进行的，是要先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指导改革的理念等，在全党全国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求在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上取得符合于历史规律的共识，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开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为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这个思想准备和社会基础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体制的外围选择一些难度较小、反抗不很激烈的改革课题，有序推进，以利于政改的全面开展。

概括我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观点是：目前到处存在着的触目惊心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清楚地表明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社会远没有完成以反专制反垄断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改革在实质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是用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到目前为止，我们远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改革就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方式，一个途径。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所介绍的普世价值和《08 宪章》，就是论述我国为什么要经过民主主义、如何经过民主主义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坚持包含民主主义在内的普世价值的理念，才能走上符合于历史发展方向的道路。

当然，我在书里表述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为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同志和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它能够有助于促进这一场意义重大的讨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发挥有益的作用。

2012年7月15日初稿，8月19日改定

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论普世价值和“08 宪章”》一书序言

近几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时起时落，但还没有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足够注意。当然，就普世价值的批判者和宣传者来说，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意义各有理解是不言自明的，前者视之为洪水猛兽，贬斥不遗余力；后者则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无价之宝，着力为之辩护正名。但就广大民众来说，由于普世价值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概念，多数对它不甚了了。因此，不论是从肯定普世价值的角度，还是从否定的角度，都有必要普及有关普世价值的理论知识，这应该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编的。

（一）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简要回顾

对普世价值的宣传和批判，体现了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是现阶段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自从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治国方略和价值理念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一百多年来，这一对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着或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震荡和变动，新阶级的出现和消失，阶级之间的纷争对抗，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起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

在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往往处于劣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专制主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而民主主义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主要只是为知识阶层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以，在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中，民主主义虽然因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曾经多次取得胜利，但往往以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告终。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专制——民主——专制——民主——专制的恶性循环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主主义的巨大胜利。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贿和当时社会的民不聊生，共产党高举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大旗，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万民归心，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娼赌毒盗被迅速清除，老百姓扬眉吐气，平等相待，社会秩序安宁和谐，古语里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现实。但在民主主义胜利的凯歌声里，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深深潜伏着的专制主义复辟的危机。如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的确立，对外政策的“一边倒”，“毛主席万岁”的呼号，以至批判《武训传》、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及“高饶事件”、批胡适、反胡风等政治运动的乾纲独断，等等，这些专制主义的征候和举动，都被淹没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崇敬和信赖之中。这种崇敬和信赖，实际上包含着浓重的“明君清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奴隶主义的反映。

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存在和相得益彰，使民主主义的倒退和专

制主义的复辟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从 1953 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三大改造”，直到 1957 年反右派，按照官方传统的说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际上，所完成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专制主义复辟。

说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达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基础、以社会成员的高度觉悟为前提，而五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广大民众还有待于现代意识的启蒙。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相适应的，主要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传统意识和思维习惯。因此，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秩序和制度，只能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专制主义。

说它是专制主义复辟，是因为通过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措施，建立、加强并巩固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现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绝对统治。例如：“三大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产生民主意识、威胁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统购统销、户口制度则取消了全国民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自由权利，确立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全面依附地位；为了镇慑对专制统治最具威胁力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把五十多万（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使他们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同时，也荡涤了任何对专制统治表示不满的意图和起而抗争的勇气，使以“独立、自由”而自豪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因为发挥了同类相残的兽性，得以跻身官场外，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庸人。这就消除了对毛泽东独裁统治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最大威胁，巩固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全面统治。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大暴露，它充分展现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卑劣和罪恶。物极必反，登峰造极的专制主义，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1976 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一代民主青年的崛起。粉碎四人帮后，以安徽等地农民的包产到户为滥觞，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摧残后，社会民众普遍觉醒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目的在于革除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专制体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新体制。可惜，领导改革开放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对改革开放抱有热烈的情怀和期望，但他们既不愿放弃专制主义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不能接受普世价值的现代意识，结果造成了改革开放跛足而行的局面，经济上迅猛发展，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停滞不前。有所改革也只在外围作一些小修小补，而对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专制主义，却丝毫也没有触动，相反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而导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问题迭出，隐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

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而且专制主义始终处于上风。这就意味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至今尚未完成，我们依然面临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而要推进、完成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首先必须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二）政治体制改革和普世价值

现阶段推进民主革命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这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制约着其他领域的改革。迄今为止，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不但阻止了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不应有的异化：国有企业改革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入权贵豪强的口袋。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归根到底都根源于政治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根源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现阶段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主要形式。25年前的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8964”的大镇压却遏止了这个符合于历史规律的进程。现在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时的有利条件，如朝野思想一致、准备比较充分等，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不利于改革的声浪却持续高涨，

两股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力——力图维持现状的权贵豪强和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已经发展成为反改革的强大堡垒，并且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在理论思想上工夫，争取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宣传阐释普世价值，使普世价值的理念深入人心，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普世价值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只有一二十年，但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却有着长远的历史。所谓普世价值，指的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是理念，也是行为准则。远古以来，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的社会里，都需要并且产生了一些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安宁而建立的规范，和同这些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避免或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些规范和观念都只有局部的意义，只在各自的国家和民族的范围里发挥作用。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冷战状态结束后，人类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使得各国各民族都有可能吸收其他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包括一些符合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普遍需要的价值观念，于是就有了普世价值的理论概念。

可以说，全世界的各国各民族都对普世价值做出了贡献，如我国传统文化里的仁爱、诚信、民惟邦本、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等等，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可以而且应该融入普世价值的理论宝库。但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却都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价值理念在当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几年来，朝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观念，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所以，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瞩目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批判者把火力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道理也在这里。

在人类历史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古已有之的，它们直到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才形成为理论性的价值理念，因为革命的资产阶级需要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并摧毁皇权和神权的精神武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内容

丰富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他们从中吸取自由以反对神权，吸取民主以反对皇权。资产阶级革命几百年的经验证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完成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吸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首先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用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这才引来毛左派和权贵豪强及他们代言人的批判普世价值高潮。

这几年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不少，但很少有人能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他们的一般逻辑是：先断定普世价值宣传者论述的民主自由是西方民主、西方自由，推论出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反过来又论证我们现在已经实行了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他们的全部论据都建立在对民主、自由的歪曲上，充塞在官方媒体上的那些文章，最典型地反映了无知加偏见的论证手法。

（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在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中，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民主则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公民在国家机器的选择和运作过程所行使的自由权利，就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以宪政民主的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以正确树立民主的价值理念，对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民主的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理论。因为民主是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所以，在理论上，自由的特征完全适用于民主。根据一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述，自由的特征是：（1）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这里面包含着人权和平等的观念。（2）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在理性指导下，这就排除了任何非理性的行为和观念。（3）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每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时，都不能剥夺或损害别人的自由权利。（4）自由的界限和规范由法律规定，换句话说，自由指的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5）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社

会文明程度。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发展。他认为“人们每次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这个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说明了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在各国不能普遍实现的原因，回答了许多自由民主反对者的诘难。

自由的这些特征，同时也是民主的特征：民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不损害他人的民主权利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它的实现受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民主的这些特征，构成为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离开这些特征就没有民主可言。所以，民主没有新旧之分，更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别。只要具备前述特征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不承认这些特征的民主则是假民主。

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权利中，民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影响着制约着其他权利的实现，例如平等、法治、人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权利的实现。就平等来说，民主本身就体现着平等，虽然每个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不等，但民主权利是相同相等的，没有多少、高低、大小之分。法治则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民主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运行；另一方面，法律必须体现公民意愿，以捍卫公民权利为主旨。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同样，没有法治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还是人权的最大保障，在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公民的基本人权如财产权、生存权、劳动权、迁徙权及出版、结社等权利，都没有可靠的保障，即使法律条文规定的权利，也往往得不到遵守。所以人类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总是把民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共产党宣言》把“争取民主”列为夺取政权的首要目标，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个层次是制度。要实现公民在政治领域的自由权利即民主权利，需要有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最根本的法规是宪法，我在前面谈到，民主要以法律为准绳，首先是以宪法为准绳。但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应以民主为指归，要体现公民的意愿，保卫公民的权利。我们提出宪政民主，要求依宪行政，指的就是以民主为指归的宪法，

而不是和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相抵触、违背公民意愿的宪法，那是不合格的宪法，至少是有缺陷的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有制订出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并且以宪法为本，制定各个领域、不同内涵的法规和制度，才能有效地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如果宪法有缺陷，而且有严重的缺陷，就很难保证其他法规制度的民主性。

我国宪法初定于 1954 年，那是社会正在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年代，宪法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如确定现行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宪法条文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通信、劳动、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等。同时也有与民主主义不相容的内容，如规定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后期的 1975 年修改的宪法，反映的是我国独裁专制统治的高潮，宪法不但写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甚至还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982 年宪法虽然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全面专政”的内容，保留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及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条文，但在序言里写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叙述，却销蚀了宪法的民主性，使其中的民主主义内容难以发挥作用。30 年来，国家虽然出台了不少法律，如公司法、物权法、劳动法等等，但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等问题上，却没有按照宪法的承诺，制定有关的法规。有些虽有相应的条例，但条例的主旨却是为了加强管理而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不是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这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同公民的民主权利是相抵触的，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就难以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现在的宪法是不能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的。

除宪法外，在国家机器的结构和形式、政治权力的授予和运用、政府职能的制约与监督，执政主体的问责与更替，以至社会生活的保障与调节等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必须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使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可资

借鉴的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大的方面如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等，都有一些有助于确立民主原则、实现民主权利的内容可供借鉴，不能“全盘”拒绝。

第三个层次是实践。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体制取代专制体制，首先而重要的是广泛宣传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使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理解民主自由的普世性，克服对普世价值的偏见和歪曲，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自由观，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思想基础。第二是逐步制定或修订符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法规和制度。法规和制度是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如果中间环节有悖于民主主义，实践就有走上歧路的危险。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现行宪法的缺陷，而民主的一大特征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准绳不准，就难以保证建筑物的质量。所以，要实行宪政民主，就必须修改宪法，删除其中的专制主义内容，改出一部民主主义的宪法。第三是推进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设计，因为民主的内涵覆盖着公民的全部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环环相扣，任何环节都不能忽视。有些人把民主局限于选举，在这个前提下论证他们对民主的批判，显现了他们对民主的偏见和无知。近几年来，胡锦涛、温家宝多次谈到要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原则上当然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如何实践，制定哪些法规制度，如何入手，孰先孰后，都需要通盘设计。第四是对改革的民主要求应该适度，要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觉悟程度相适应，既不能借口“群众觉悟不高”、“没有民主要求”，或“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等等谰言拒绝民主，也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和要求，以免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反对者攻击最集中、火力最猛的价值理念，因为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者，都并非偶然地把民主视为危害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所以，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广泛地开展关于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的讨论和宣传，使这些价值理念深入人心。这个讨论和宣传的过程，将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全民启蒙运动。

（四）结语：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民间涌动着对十八大和十八大后政局走

向的猜测和期盼，议论最多的大概要算是政治体制改革了。人们普遍意识到，现行体制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是当前社会种种弊病的总根源，为了克服各种形态的社会危机，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都要求我们进行充分的、细致的、切实的准备，首先是思想理论的准备。只有确立符合于历史规律的理念，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健康运行。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所有文章，都围绕着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从晚清洋务派开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之中，这个矛盾没有解决，意味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下两代的仁人志士的双肩上。我前几年写过一篇纪念胡耀邦逝世 20 周年的长文，题目叫《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我为什么把这样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共产主义者说成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呢？我在文章里指出：“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对胡耀邦的评价，我得出一个普遍性的观念：“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我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入党宣暂时都表示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抛开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不说，希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它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类高度文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那是我们几代以后子孙的事情。你如果真心诚意地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就必须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我赞成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所谓“经过民主主义”，换一个说法，就是“完成民主革命”，它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两代人都只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没有条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与其主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不如提出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这本小册子里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直接间接地说明，为什么要

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08 宪章》和有关文章，则说明怎样“经过民主主义”，并且为民主革命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目標模式。希望这些文章有助于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正确理解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2012年9月11日

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写在《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的前面

今年是毛泽东阴谋策划、操纵的反右运动55周年，有几位当年受害难友的子从从去年开始，就筹划编印一本难友的留言集。我非常赞成这个很有意义的倡议，并且义不容辞地承诺为它写一篇前言。

（一）留言集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这本留言集记录了二百多位反右运动罹难者发出的长期郁结于心头的心声，是控诉，也是反思；是揭露，也是期待。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留言集本身。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听到也经常呼喊一个口号，叫“毋忘国耻”。我觉得这本留言集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毋忘国耻”。反右运动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手续，只听凭一个独裁暴君的狂想妄断，就把55万（一说300多万）知识分子，包括大量民族精英投入灾难的深渊，多少罹难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饿死、累死、整死、打死，抛尸荒野，骸骨无存。运动中夫妻反目，兄弟相讦，亲情、友情、人情、真情，荡然不存；道德沦丧，信义无踪，为大跃进和文革准备了精神条件，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社会的道德风貌。它不仅给难友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不幸，而且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无穷的灾难，这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奇耻大辱吗？“毋忘国耻”，就是要让子子孙孙都牢记这个给他们的父祖辈和国家民族带来苦难的耻辱，探寻形成这种灾难的根源，克服它，铲除它，永远不要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留言集的社会意义，也可以用我们常见的四个字来概括：“继承遗志”。反右运动前期，许多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怀着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愿望，对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结果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他们批评的许多

弊病和劣迹，不但没有改正，反而愈演愈烈。时至今日，专制权力的无限膨胀，导致官民对立、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社会动荡，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继承遗志”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希望后人继续发扬热爱祖国、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投入体制改革和争取民主的大潮。

“继承遗志”还有第二个含义：难友们多年来一直要求当局彻底平反这个冤案，为当年的严重错误正式道歉，赔偿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当局仍然坚持 31 年前的错误决议，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迄今拒绝道歉赔偿。许多难友在留言集上强烈要求当局“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对受害者补发被克扣的工资，并给予精神赔偿”。有的难友质问：“难道要拖到我们这一代死了就了结了吗？”“有生之年未能获赔，子子孙孙也要坚持下去。”“这代不补下代补，下代不补再下一代都要补。”彻底平反，道歉赔偿，这是所有难友的共同愿望。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许多难友愤恨而没。一位前几年病故的难友留下遗言，期待后人“为我们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并向我们告慰。”留言集寄望于后代的，就是“继承”这个“遗志”。

（二）中国走向专制的远因和近因

我在前面说的“毋忘国耻”和“继承遗志”，是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这个理论层面来考察而获得的认识，反右运动正是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在 1957 年的历史条件下趋于尖锐化的结果，是民主和专制的一次正面交锋。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根据建国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国家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经济建设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共同纲领》又规定国家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却是同民主主义格格不入的。

这就表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具有两面性的国家，既有民主主义的一面，也有专制主义的一面。这个特征决定了它的过渡性：既有可能向民主主义发展，成为民主的国家；也有可能向专制主义发展，成为专制的国家。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向，就成为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基本形式。

压倒民主主义的基本缘由。从近因来说，导致中国专制化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在理论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鼓舞了、吸引了无数因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而苦恼彷徨的知识分子。但这个理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却走上专制主义的道路，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远因来说，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积累，浸透了整个民族和社会各个角落，每个国民都无例外地受到它的熏染；而民主主义在中国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只影响着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这个强弱分明的阵势，是一百多年来专制主义屡屡身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混合物。它既主张“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肯定“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认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同时又宣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这就在理论上隐伏了专制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前景。导致中国专制化的另一个近因是：在实践上，毛泽东既有改造社会的雄心大志，也有高踞人上的无垠野心，既是革命家，也是野心家。在他前半生的革命生涯中，充满着机智的谋略和奸诈的阴谋，展现了革命家兼野心家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踌躇满志，一方面致力于筹划建国的大政方针，同时也为了巩固最高统治地位而绞尽脑汁。他少年时代在《咏蛙》一诗里表露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发声”的专制野心，这时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最佳土壤。批判《武训传》，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高饶事件，反“反冒进”，批“小脚女人”，“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都表现了他的独裁专制，民主

主义的发展，当然不符合于他的极权统治的欲望。总之，无论是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来考察，还是从毛泽东的统治实践来分析，五十年代的中国走向专制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以专制主义的目光和心愿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所以，推行社会主义的结果，就必然走向专制主义，离民主主义却越来越远。这个发展趋势不能不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实行统购统销，垄断基层组织领导权，外行领导内行，教育领域全盘“苏化”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权利和利益。所以，虽然共产党和毛泽东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民间的不满和抗议已经不断出现，农民杀猪砍树，工人罢工示威，学生罢课游行，这些还是浮在最表面的抗争。加上外有苏共 20 大和波匈事件的刺激，内有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鼓励，更激起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反思和躁动。最后起作用的，则是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各级党组织的动员，使大量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高潮。所以，反右运动前期的大鸣大放，是中国走向专制化的必然反应，是民主主义抗拒专制主义的集中表现，只是由于毛泽东出于巩固独裁统治的需要，提前把它引发了。有一位难友在留言里说：“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民间运动，你不整风，也迟早要发生的运动。”

（三）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

从表面上看，当年的绝大多数右派难友确实是在“帮助党整风”，他们提出的批评建议，都针对着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戴和期望。在这本留言集的许多留言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这种心情。即使是在一些提出民主自由口号的激进大学生中，也没有人“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批评的，都是一些表现着走向专制化、具有专制性的缺陷，所提的建议，则反映了对中国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期望。这个最基本的特征，使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具有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

毛泽东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场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没有完全说错，55 年前的反右运动确实是一场革命，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因为中国远不具

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历史的现实却是正在从民主主义滑向专制主义，这个客观形势只能召唤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尽管这是一场被动的、不自觉的革命，而且很快就被专制暴君所扑灭，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它仍然是一页不可磨灭的光辉记录。毛泽东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他和他的追随者是革命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则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这是对历史的颠倒和亵渎。

这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民主与专制的大搏斗。以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和当天毛泽东给全党下的指令《组织力量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标志，斗争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按照官方的说法，此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段，此后是“反击……猖狂进攻”的阶段。但是，事实上，所谓“猖狂进攻”只不过是民众对专制体制的批判，那么，“反击”就只能理解为专制势力对民众的民主要求的粗暴镇压。所谓的反右运动，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历史运动，一个是民主反专制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专制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用暴力或和平的手段，改变已经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推进这种变革的社会群体，就是革命者，革命派；抗拒这种变革，维护旧制度旧结构的社会力量，则是反革命者、反革命派。五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是一个前途尚未最后定局的过渡时期，一个前途是民主主义，一个前途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而当时已经出现的趋势，则是国家正在向专制主义倾斜。反右运动前期的群众运动，正是为了挽救民主主义、遏制专制主义；后期的反击“右派进攻”，则是专制势力为了加强自己的绝对统治而进行镇压。综观这个历史过程，反专制的革命者和反民主的反革命者的分野就十分清楚了：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或几百万知识分子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批评建议，是对专制体制的挑战，是对民主自由的期待，是符合于历史规律的呼唤；而以毛泽东为主帅、邓小平为次帅的镇压者则是反革命派，因为他们为了巩固专制统治，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但拒绝那些合理的要求，而且残酷

镇压呼求民主的群众。

反革命的专制势力打出冠冕堂皇的招牌，用一些大逆不道的罪名，把革命者打入人间地狱，这种手法，在中外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但1957年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和反革命的搏斗，却有着一些独有的特点。其一，这场斗争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反革命专制势力有计划地诱发的，毛泽东自诩这是他的一场“阳谋”，但他那一系列“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策划、部署，却说明这完全是用心邪恶的阴谋；诚如一位难友所说：“这是一场用欺骗手段巧设陷阱的大阴谋。”其二，革命的参加者多数是不自觉地、被动地卷进这个斗争的，许多人是在党组织的再三动员下才勉强提了一些意见，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履行着把国家从专制主义泥坑拉回民主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其三，这是一场有言无行的斗争，落入陷阱的原因，都不外乎会上发言，写大字报、小字报，私下议论，甚至是书信、日记被公开，总之只是在言论或文字上透露了一些真实的思想观点，所以有难友说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其四，许多参与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把迫害革命者看作是保卫革命的行为，对自己的同志、师长、同学、亲友进行无情的批判、打击，同他们划清界限。这些人不论是真心实意，还是装腔作势，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民主革命的对立面，助纣为虐，成为反革命派的帮凶。其五，专制势力把革命者打入社会最底层，与“地富反坏”并列为“黑五类”，成为不齿于社会的贱民阶级，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平日受尽侮辱欺凌，一有风吹草动，就被拉出来批斗，遭到无休止的迫害，甚至祸延子女亲友，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备受歧视。更有大量罹难者在劳改场所死于非命。其六，22年后，运动的迫害性质大白于天下，而当年镇压革命者的次帅邓小平却仍然坚持那场反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拒不平反，只以“改正”的名义掩人耳目，而且拒绝道歉赔偿。

这些中国特色，使1957年的民主主义革命和专制主义反革命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不能正确理解民主主义革命和专制主义反革命的界限。长期以来，官方都根据毛泽东的定性，把被划为右派的人称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一些毛派分子也把当年罹难的革命者说成是反革命的反动派。记得在21年前的反和平演变喧闹声

中，有一位教授说：“胡耀邦的最大错误是平反冤假错案，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在他的视野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革命者都是牛鬼蛇神，仍然应该作为专政对象受到管制、压迫。有一位难友在留言集里谈到，他“改正”后在一个县的政协工作，前几年当地举行书画展，他画了一幅上有红日高照、下有三个山峰的国画。展出后初评二等奖，复评时有人发现作者是他，便说这画有政治问题：“三把小刀指向红太阳”，说他“右派分子不老实”，还有“右派劣根性”，结果不但取消了二等奖，连参展资格也被剥夺了。可见，对 1957 年的革命反革命的颠倒，不但存在于官方的文献和舆论，而且在民间也有很大的市场。时至今日，应该是还原历史事实真相的时候了，应该把 55 年前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让广大民众了解，究竟哪些人是革命派，哪些人是反革命派，从而划清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界限，在改革和发展的取向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四）简短的结语

55 年前的那场被称为反右运动的政治运动，只有放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历史框架里，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本质；也只有认清它的本质包含着民主反专制和专制反民主的两个过程，才能正确地分辨哪些人是革命派，哪些人是反革命派。这本留言集就是 55 年前被迫害、被镇压而目前有幸尚存的革命派的自白和宣言，同时也是他们对子孙后代和社会的嘱托和期望。他们在留言集里所表达的愿望，最强烈的呼求，除了彻底平反，道歉赔偿（一难友提出“还我青春，还我公道”）外，就是揭发批判毛泽东。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反右运动不仅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陷于灾难，而且带来长期的社会道德危机。运动期间，传统道德中的亲情、友情、人情、恩情，都遭到无情的撕裂，在各种批判场合，充斥着诛心之论和违心之言，这就开启了社会道德沦丧的潘多拉盒子。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破坏了孕育民族精英和人才的环境。钱学森去世前的“世纪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其实答案早就有了，反右运动摧毁了大师级人才赖以产生的机制和条件，它带来的后遗症——道德沦丧，理性溃灭，高等学府和研究机关的党化官僚化，等等，直到今天，还在严重地抑制着杰出人才的孕育和成长。回顾 55 年的历

史，只有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恶，清除他的影响，我们国家才能阔步前进，健康发展。在留言集中，有好几位难友表示，要把批毛列为自己余生的主要抉择。有一位难友说：“毛泽东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斗了中国几代人。我们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与毛斗，其乐无穷，即开展批毛。”另一位难友在留言中谈到评毛批毛时提出：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毛意识形态枷锁，推翻毛记政治架构。”这些讨伐反右运动罪魁祸首毛泽东的宣言，成为留言集的又一亮点。

这本留言集的编辑出版是一件十分可贵的盛事。侥幸存活到今天的五七难友已经不多了，而且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甚至九十开外的老人，能把他们的受难往事、创伤、心愿和期望浓缩在几百字里，确实是很难得、很宝贵的，把他们的留言汇集成册，就更难得、更宝贵了。这是几位五七难友子女在反右运动 55 周年之际献给社会、也是献给罹难先辈的厚礼，这本凝结着他们心血的文集，具有历史记忆和启蒙当代的双重意义，将会成为民主革命历史上一份有价值的文献。

2012 年 9 月 6 日

附录

6 月至 9 月微博选录

（按：下面的内容分别选自腾讯和网易的微博。其中 8 月 1 日以前均选自腾讯；8 月 2 日腾讯微博被封后，直到 9 月 23 日，选自网易；24 日后腾讯启封，仍选自腾讯。两者不同处，腾讯限写 140 字以内，微博后的时间记录到秒；网易可写 163 字，时间记录到分。）

生活履痕

今天是儿童节，许多儿童时代接触的人和事，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童年的直率、天真，却深深地沉积在脑海里，影响着思想和行动。我 1982 年曾写过一封给老同学们的公开信，《童心不泯，壮志长存》，与老同学们共勉。在 30 年后的今天，虽然人事沧桑，但我仍愿以这八个字与朋友们共勉。（2012/6/1—20: 49:

从香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起一件往事。两年多前我和几位朋友商量发起举行一次关于反右运动的学术研讨会，为此需要发一个创议书。过了不久，网上出现一份要举行右派代表会议的创议书，居然我也被列为发起人之一，不禁大为惊讶。学术性的研讨会变成了组织性的代表会，因此引起一些不应有的麻烦。（2012/6/7—20：59：17）通过这件事，我对签名共同发表的东西，总是心有惕然，有看法宁可自己写文章，不用跟别人凑热闹，也不拉别人在我的文章上签名，免得连累别人。这样，有事文责自负，无事清清爽爽，倒能自得其乐。（21：14：04）

今天下午，我邀集了几位朋友茶叙，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应邀前来的有两位亲身经历过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有五位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有两位关心这个历史事件的朋友。在 6 月 8 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大家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并且表示希望能够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作出自己的贡献（2012/6/8—21：00：09）

上午我和曾孙捉迷藏。他藏我捉，我装做没有找到他，东寻西找，最后才指出他藏身之所。他说：太公糊涂，找不见我。我说：我把你找出来了，不糊涂。过了一会我去医院打针，拿了就诊卡和注射单，却忘了拿药，到了医院才想起，回家拿药时说：我真糊涂，去打针却没有带药。曾孙说：这下你真的糊涂吧！哈哈！（2012/6/16—21：34：54）

昨天听一位朋友说，我托他复印的《回归民主》一书，已在复印社印好 20 本，不料都被警方抄走了。他说，现在那些复印社每天都有人来查，紧张得很。哎！为了“保卫十八大”，竟搞得那么紧张！我的《回归民主》怎么就会威胁、危害十八大了？或者，书里什么地方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以致不能不采取如此严厉的专政手段？谁能告诉我？（2012/9/4—20：27）

这几天秋意渐浓，上午在小清河旁散步，微风轻拂，碧空如洗，远眺西山，郁郁葱葱。又想起黄宗英悼念郭元同的话，说他们最喜欢遥望西山的落日。郭元同去世将近七十年，黄宗英还健在吗？她这一生丰富多彩，如果他们二人白头偕老，郭元同将会有何等成就？哎！

人生落差如此之大，真令人不胜叹息。（2012/9/5—21：03）

今天上午十点后家中无人，我放喉唱了几首青少年时代的歌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茶馆小调、团结就是力量。唱后休息，回味歌词“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絃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等，想起当年豪情满怀，气概昂昂，如今白发苍苍，虚度此生，不禁热泪横流，不能自持。（2012/9/7—22：08）

可怜天下“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子女之心。现在邮局有母亲包裹，每个 100 元、200 元各一种，由邮局直接寄给山区贫困母亲。把对已故母亲的思念，转化为对贫困母亲的帮助，应该是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很好的方式吧！我已连买三个月，每月 300 元。（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2012/9/10—21：16）

我好久没有游泳了，今天上午去游了一次，测试一下我的体力。50 米的泳道，游到一半就不行了，停下休息，气喘吁吁。两个来回，200 米的泳程，中间休息了 7 次，用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虽然如此，我还是自我感觉良好，给自己打了 60 分，希望以后再游能提高几分。（2012/9/28—21：18：14）

往事杂忆

上午在小清河畔的林间小道漫步，小道一边的草坪刚被剪过，阵阵浓郁而熟悉的草香扑鼻而来，引起我对少年时代的回忆。我 13 岁离家前几年，每逢暑假，每天都要背着草筐出去割草，割草时总有草香伴随。把草挑回家后摊在地上晒，更是清香弥漫。晒干的草打捆（冬天烧饭用）时，香味同鲜草就大不相同了。（2012/6/15—21：13：22）割草时顶着骄阳暑热，常汗流浹背，很累。一次在坟地割草，见一株草的中心伸出一根尺把长的草杆，开着许多粉红色的小花，螺旋形地从中间绕到顶端。我把它割下来，插在草筐上。回家时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说这是太子参的花。后来看到这花就挖，挖了太子参带回家，母亲炖给我喝，果然精神很好，不觉得累了。（21：33：19）

1966 年冬，在中共杭州市委机关旁的大墙上，贴出一张每个字有近一米见方的大标语：“揪出杨献珍的秘书杜光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

利！”我看了只有苦笑。他们以讹传讹，把我当作杨献珍秘书揪出来倒也罢了，还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不知道这算是抬举还是侮辱，但它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终生难忘。（2012/6/19—20：55：53）

深圳罗湖水库小学为举办谢师宴，要每个学生交 400 元。谢师宴的陋习历史悠久，我就是它的受害者。1939 年我小学毕业，学校要办谢师酒，每个毕业生出两三块钱。我向父亲要钱，他说：教书是先生份内的事，办什么酒席，不交！就是因为没有参加谢师宴，我的毕业文凭被总务主任李后秀卖给一个五年级的同学，（2012/7/6—21：10：51）因为他已经 18 岁，进入壮丁年龄。按照当时的规定，要在 18 岁以上的人中抽壮丁，抽中的要当兵，但中学生可以免抽壮丁。而进中学必须要有文凭。李后秀就以我不参加谢师酒为借口，把我的文凭给了他，捞了一笔钱，还逼着我改名字，因为文凭上的名字也归他了。（21：31：23）这样，他就成了林道茂（我原来的名字），我却变为林加智。为了再拿一张文凭上中学，我又读了一年的六年级。我有理没处说，对权势憎恨了一辈子。我读第二个六年级时，李后秀已调到另一个小学当校长。有一个星期天，我约了几个同学，到李后秀当校长的小学，把玻璃窗都砸碎了，算是出了一口气。（21：41：53）（第二天看到有一网友留言：“后来呢？”于是加了补充说明）第二次小学毕业后，我就作为林加智上了育青中学。读了一年，1941 年到上海大哥处继续上学，恢复原名林道茂。1946 年到北京上北大，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政府特种刑事法庭通缉，于是改名杜国光，到华北平山，嫌中间那个国字写起来麻烦，把它去掉，就成了杜光了。（2012/7/7—20：42：57）

我的老家在温岭横板桥村。但出生在天台，四五岁回温岭，住在南监（离新河镇不远），13 岁离家到上海，18 岁到北京。七十年来梦魂萦绕，却只回去过四次，但梦中常温摸鱼割草等旧事。有几次遇见温岭人，我还能勉强用温岭方言交谈，感到非常亲切。（这是对一条跟贴的回应）（2012/7/11—11：12：01）

今天是史学奇才沈元在 43 年前被捕的日子。1955 年他以文科高考全国最高分进入北大历史系，1957 年因摘译并传播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的秘密报告而被划为极右分子。摘帽后于 1962 年受到黎澍赏识，

被调进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急就篇〉研究》，得到郭沫若、范文澜的高度称赞。接着又发表5万字的长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2012/9/1—19：48）《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摘登。他的成就为人嫉妒，北大和历史所都有人上告，指斥“右派翻天”，“白专道路”，黎澍也被批为重用摘帽右派。沈元无奈，只得用笔名发表文章，不料也为人识破。他悲愤之下，想出国觅一可做学问的场所。据官方的叙述，他于1969年9月1日以鞋油涂脸，到非洲某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识破逮捕，不断批斗后，1970年4月18日被枪杀。（20：08）但沈元姐姐沈蓓却不信官方说法，她说：“沈元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来？”沈元留下大量遗稿，前几年经过沈蓓等的努力，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郭罗基曾以《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为题，专门作了介绍。可惜的是还有一箱子遗稿，不知下落。沈元死时才32岁，一个史学天才就这样陨落了。这就是钱学森的“世纪之问”的答案。（20：27）

文革初期，我和另一位名叫江涛的老师都被关起来，一些小红卫兵多次侮辱我们取乐。有一次让我们脱下鞋子，相互扔向对方，而且一定要扔到对方头上。没有扔到头上就骂，吐唾沫，还用脚踢；扔到头上就哈哈大笑。我没有办法，只好在江老师把鞋子扔过来时低下脑袋，避免鞋子扔到脸上。幸而后来有两位高年级的同学过来，把他们说了一顿，才把我们解放了。（2012/9/6—21：27）

明天就是“九一八”。记得1946年进北大不久，同宿舍的周麟文教我唱《放下你的鞭子》里的歌曲：“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沈阳城。”当时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但悲壮的曲调仍然使我们充满悲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青年？（2012/9/17—21：00）

浙江有一农村支部书记买了一个蒸笼，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爱，在蒸笼上写上“毛主席万岁”。有人揭发，说他胆敢把毛主席放在火上烤！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入狱，粉碎“四人帮”后才放出来。我改正后看的第一个党内文件，就是浙江省委为他平反的通报，所以印象特别深刻。（2012/9/21—21：07）

今天是秋分，我想起上小学时学的一首歌：“秋风起，满地霜，倭奴入寇逞豪强，杀我同胞夺我地方。中华好男儿，哪怕无耻小东洋，百万将士上战场，不杀倭奴不回乡！”幼小的心灵满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东洋又在兴风作浪，历史真是一部不可忘却的教科书啊！（2012/9/22—21：00）

今天是中秋节。小的时候只听说过一个传说：元朝末年，月饼里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字条，却没有见过月饼是什么样子的。50年代初有一次得了《光明日报》的稿费，才买了几个自来红、自来白，觉得吃月饼太奢侈了。抚今思昔，感慨万千。（2012/9/30—21：22：26）

我对犹太人颇有好感。上中学时多次路过提篮桥犹太街，见有些犹太人衣衫褴褛，铲子敲着大饼铛，喊着“hot dog! hot dog!”十分同情。1948年2月到十六浦码头送大哥去美国，码头上挤满了犹太人，原来他们搭这条船经美国回巴勒斯坦，建设以色列国。我为他们高兴，祝他们平安回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福地”。（2012/9/30—21：38：58）

思想轨迹

“六·四”是屠杀和暴政的见证。血债必须清算，罪恶必须惩办。现在处于高位的领导者毕竟不是血案当事者，如果有人能像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道歉那样，像勃兰特在波兰的死难犹太人墓前下跪那样，对“六·四”作出真诚的道歉和合理的赔偿，他就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不知道谁有幸能获得这份光荣？（2012/6/3—21：34：47）

“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是宽容。”这是一句值得所有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奉为座右铭的箴言。争取自由民主而不懂得宽容，就有可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暴力与专制。让我们学会客宽容吧！哪怕是为了自己。蔡珊珊的跟帖说得好：“宽容别人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自己，而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2012/7/8—20：33：14）

我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情，平静地面对变动不居的客观环境，不以得而喜，不因失而悲。因为我善于从不利不愉快的遭遇中发现有利或有趣的因素，陶冶我的精神。对于社会上因苛政而产生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也愤怒，也抗争，并致力于谋求社会进步的斗争，

但并不奢望出现奇迹，因而也不因失望而悲观（2012/7/9—19：17：32）

自由首先是应以理性为基础，其次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违背这两条基本特征，就不是自由，而是滥用自由。任何人都没有非理性的、妨害他人自由的权利。（这是转播一条讨论自由的微博及其跟帖的留言）（2012/7/9—19：57：05）

共识网 4 日发表荣剑文章，论述免于恐惧的自由，写得很好。我认为，中国几十年来最缺乏的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加深着人们的恐惧感。直到今天，掌控政法部门的权贵势力仍然热中于制造恐惧。我们要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必须制约和限制这些制造恐惧的政治权力。（2012/7/9—20：09：44）。 “没有恐惧的自由”是我们当前必须努力争取的基本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比争取其他任何权利都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因为它密切联系着许多有关的公民权利。（21：07：50）

福建马尾“416 三网友”案中吴华英弟弟吴昌龙被关 11 年，至今未释。他因所谓福清纪委爆炸案被判死缓。他姐姐旅日华侨吴华玉多次申诉，6 年前经全国人大督办，仍遭拖压。不久前她向我国驻日使馆递交申诉书，5 月被告知，最高法院答复“案件还在补充侦查中”。被关 11 年还在补充侦查，可见法院如何草菅人命。（2012/7/11—21：23：31）

今天收到顾骧的《煮默斋诗钞》，其“后记”引了陈毅的两句诗：“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种遍自由花”。好像是为当前而写似的：对维权人士和不同政见者的残酷迫害，应该有到头的日子；经过我们的辛勤耕种，自由之花必将开遍中华大地。这是希望，也是理念。民间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2012/7/12—20：44：32）

大午先生，别来无恙！9 年前事无法释怀和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必要感到屈辱。作为具有“大午特色”的民营企业家，你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应当把你所受的苦难，看作是你的光荣，因为你的事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才会受到专制主义的迫害，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这是对一条微博《悲愤孙大午》的回应）（2012/7/16—20：41：11）

上午读一文章，内引宋朝杨万里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

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反复诵读，感慨系之：此诗切实地形容了我的思想观点在当代的遭遇：文化专制主义不许我的思想在他们的领地出现，我却仍然日夜不停地发出喧声。一旦实现了文化自由，我的思想必然堂皇地传播久远。（2012/7/24—20：56：12）

今天在《十日资讯》上读到焦国标的“北京札记之四”，风趣而深刻，回味无穷。如，有朋友说，一些同学熟人避而不谈他，他说：“他们不配谈我，他们是地上的爬虫，我是天上的飞鸟。”“爬行动物连飞鸟的屁都闻不到，想起来我就自豪得不行。”我读后不禁哈哈大笑，说得真好，挖苦到家，也豪迈到家。不过，似乎少了点宽容，未免美中不足。（2012/8/14—20：59）焦国标还说：“一胎化令无数中国夫妻留下永远的遗憾。”我想给他注一下，这个夫妻包含了父母、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三代。我的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孙子也只有一个儿子，有一张照片是我和儿子、孙子、曾孙四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四代同坐，欢喜之余，却又无限伤感。古人有所谓“身后凋零”的说法，我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凄凉和悲哀。（21：28）

刘宾雁生前为自己拟了个简单明了、却又惊世骇俗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说它简单明了，是因为这个意思，连小学生都看得明白；说它惊世骇俗，是指世俗凡人很少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刘宾雁却达到了。他以此自豪且自慰于地下，同时向我们每个人质问：你做到了吗？可惜，当局竟不许这些话镌刻在墓碑上。（2012/8/15—20：43）

我们主张非暴力，但不主张放弃用暴力反抗暴力的权利。对于某些群发性事件中出现的过激行为，如烧警车、砸办公室之类，我一方面不赞成，同时也给予理解和同情，支持因此而受到报复的维权者。

（这是对一条微博的回应）（2012/8/24—20：27）

五十年来，有多少无辜民众惨死在这个非法而残酷的罪恶制度之下，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地方在纪念，在庆祝，在千百万死难者的尸体上载歌载舞！看了这些令人恶心的照片，不胜愤慨！（在一位朋友的微博上看到重庆、贵州、江西、浙江等地举行“纪念劳教制度创立 50 周年文艺晚会”的 6 幅照片，愤慨之余，写了这条跟帖）（2012/8/25—20：53）

荣剑在《“喉舌”胡锡进》一文里谈到：胡锡进在微博里说，中国自由派“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这使我想起不久前袁鹏的“新黑五类”，还想起1991年的“反和平演变”。它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滥调再现，目的在于抵制日益高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2012/8/26—20：33）把自由派、改革派说成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这个调门早就不新鲜了，但把它比喻为癌细胞，却是胡锡进的创新。他引申出的结论，是说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就意味着癌变，死路一条，所以中国万万不可走自由民主的路子。（20：44）荣剑文章对胡锡进的喉舌身份和功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但他说胡有两百多万粉丝，却把我吓了一跳，粉丝者，fans也，意为热烈的追随者、崇拜者。这样的人居然有两百多万追随者，中国还有希望吗？荣剑后来说：这么多粉丝“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谩骂的字眼。”那就不是粉丝而是“愤丝”了。（20：59）

刘亚洲在送给何家栋的书上题字：“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最缺何家栋。”何以说不缺毛泽东？我认为这指的是毛式人物、毛派思想，无法无天的独裁者、野心家，薄熙来就是一个典型。他倒台了，还会有别的毛式人物，因为它的社会基础还在。至于何家栋，很少有人达到他的思想深度；最缺的另一含义是他的文集不能自由出版发行，他的思想不能广泛传播。（2012/8/29—20：50）

我十几年前就主张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因为土地私有是同小农经济最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也是最有利于农民融入市场经济的占有形式。可惜没有人听，各地当权者依然热中于土地集体所有，因为这种所有制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得利。（2012/9/11—20：53）

鲍彤说：“什么叫唱红？唱红就是顺我者昌；什么叫打黑？打黑就是逆我者亡。”精彩极了。我想照猫画虎，把“扫黄打非”概括一下，什么是扫黄？扫黄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什么是打非？打非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2012/9/13—20：40）

胡绩伟老人去世了，两天来悲不自胜，唯一可以告慰胡老的是：

我将继承你的遗志，为中国的民主化、为新闻自由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12/9/19—21：15）胡绩伟老去世后，其家人遵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只在家里设一灵堂。我今天上午前往灵堂拜祭，在签名册上写了四句话：“哲人其萎，国士同悲；誓继遗志，共推民主回归。”（2012/9/23—20：23）

南京社会科学院前院长沈立人已经 86 岁了，仍然奋笔疾书，臧否时政，并且辑印成小册子《老生短叹》，发给朋友交流。最近收到第 11 期《老生短叹》，收有今年 7、8 二月写的 22 篇文章，每篇近一千字，短小精悍，深入浅出，文字流畅，说理透彻。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今天，通过自印小册子的方式，传布人生感悟，实在难得。希望有更多的老人能给社会留下自己的体验。（2012/9/20—20：39）

网络故事

上一条微博里有《08 xian zhang》这几个字，点击“广播”后，被告知有敏感词，无法通过。我试改了好几种写法，都没有通过。最后是改为现在这种写法才得以完成广播。这就让我犯难了，我准备写的文章里，可能不断有这个词汇，我总不能老是用数字和洋文代替吧。怎么办？到时候再说吧。（2012/6/2—21：13：59）

昨晚发了两条关于今天的微博，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啼笑皆非。第一条通过了，第二条写完广播后，第一条却消失了。我重写了一遍，把两条都转到网易，回头看腾讯，两条都不见了，我赶紧从网易把它转回来。不一会儿，网易这两条微博也没有了，我又一次把它从腾讯转到网易，同时转到美国中文网和博客大巴。（2012/6/4—20:43:49）这两个网都通过了，但博客大巴说明内有敏感词，可以收入，却不能向读者开放。这时再看腾讯，两条微博均已无踪无影，我只得再次从网易把它转回来。这时已经九点半了，我没有耐心再周旋下去，就不管了。转而看看其他朋友的微博。十几分钟后回到腾讯，第一条没有了，但第二条还在，已有 17 位朋友转播评论。（20：59：16）今天再看，腾讯还有昨天的第二条微博，但转播和评论的还是 17 人，说明昨晚到今晚，它已经不能再向读者显示了。网易和美国中文网上的两条微博，昨晚关机前还有，今晚也找不到了。博客大巴上的微博还在，

但没有读者。比较起来，我还是欣赏博客大巴的做法，他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不向读者开放，使我心里有数。（21：12：18）还有一点要补充，我每次点开腾讯微博后，都要先看“转播和评论”里的跟帖，了解朋友们的反应。昨晚第二条微博既有17位转播和评论者，当然也应看看后面的评论。不料，点出来后，连一条转播和评论都没有了，显示的却是“暂无有理由的转播或评论”。这就是说，只有“有理由的转播或评论”才能显示，这17位朋友的转播或评论都是“无理由”的，真可笑！（21:27:35）

晚上通过qq邮箱给几位朋友发送《杜光文存》、《杜光文稿》、《评八确立五不搞》等的电子版，好几次都被告知：“邮件中可能包含不合适的用语或内容”，因而拒绝发送。试验几次，拿掉附件《杜光文存》和《杜光文稿》，就能发出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杜光”二字已经成了“不合适的用语或内容”了。（2012/7/7—21：10：34）

刚才打一条微博，被告知有敏感词，想尽办法对几处可能的敏感词做了改动，试了六七次，还是不行。转到网易试一试，几个敏感词换成拼音字母，倒是进去了，但几分钟后也不见了。唉，敏感词越来越多，正经话没法说了。（2012/7/17—21:32:23）

刚才介绍两篇奇文，想同朋友们共赏，不料打后久久不见显示，大概是因为其中有些敏感词和敏感人名吧。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受束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啊？（2012/8/10—21：26）

我在腾讯的微博8月2日第二次被封时，页面上显示的是“尊敬的用户，你好！你最近的行为被系统认为具有风险，所以暂时不能登陆微博。”不管怎么样，还承认我是用户，而且是“尊敬的用户”。前几天再打开，却被告知：“用户不存在”，这就是说，不承认我是用户了。哈哈！把我扫地出门了。（2012/9/11—21：20）

我在腾讯的微博8月2日被封杀，多次打开收藏夹，都被告知“用户不存在”，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误打误撞竟然打开了，是解除封锁了？还是别的通道没有封紧，被我溜进来了？现在还有别的事，晚上再说。（2012/9/24—17：05：24）看到今天下午的微博有37位朋友转播或附言，真是高兴。我已经有一个月又23天不能在腾讯写微博了。转到网易后，我的微博多数无人理睬，偶尔有一两位转播或留言，实在气闷。但为了留下思想痕迹，还是不断地写。现在能回到腾讯，和

许多朋友交流，丰富晚间的生活内容。感谢腾讯，封杀不是他们决定得了的。（20：11：01）

反垄断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的文章。虽然以《超越争议，公平竞争》为题，实际上是一发反垄断的重炮。这篇文章的结构很妙，全文分三部分，第一二两部分都比较含蓄，提出必须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国有资本应在非公有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发挥作用。（2012/6/5—21：02：02）第三部分分析“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实质在于竞争的公平性。他揭示现有企业均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分成三六九等。国有企业具有体制内的各种优势，对民营企业形成市场壁垒。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有企业兼并。在钢铁、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出现民企被挤出的案例。（2012/6/5—21：13：14）所以他最后说：“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不就意味着垄断的消除吗？（2012/6/5—21：24：04）

据有关规定，本月8日开始，金融机构可根据市场情况，将存款基准利率提高10%，贷款利率可下降20%。银监会虽规定降低存贷款利率，但执行的很少。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例，多数大银行仍维持3.5%，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甚至在新定3.25%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达到3.575%，比降息前还高。这说明什么？（2012/6/11—21：14：32）从问题的本质来看，这反映了金融业从全面垄断向市场倾斜的趋势。以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规定得很死，丝毫没有活动的余地。现在虽然只有10%和20%的自由度，但多数银行就利用了这个自由，拒绝政府的降息规定，提高存款利率，这就有了竞争。虽然竞争的范围十分有限，但就其性质来说，是市场对垄断的胜利。（21：27：35）

最近一期《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文章是《格力阴谋》，文章切入点是在5月25日的格力电器股东大会选举格力电器董事时，9个候选人中，8人当选，唯一落选的是珠海市原国资委副主任、不久前刚被派去担任格力集团（格力电器的最大股东）党委书记兼总裁的周少强。这篇文章文笔不佳，但内容非常丰富，很有价值。（2012/6/18—20：07：

49) 这篇文章蕴含着垄断与反垄断的角力、市场与权力的博弈。通过这个典型，文章描画出一幅国退民进的图景。周少强的落选，就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结点。他是官方派去的高官，又代表着第一大股东（占有 18.22% 股权，第二大股东才有 1.75% 股权），在通常情况下，有其中一条就可以当选为董事，他兼有两条却落选了。（20：37：11）这举结果反映了市场原则对权力的抵制。出现这个现象不是没有前因的。20 多年来，格力集团和格力电器的实际掌门人是两者的董事长朱江洪，他在格力集团副董事长和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的配合下，格力电器业务蒸蒸日上，通过股权改革，格力集团在格力电器的股权从全面控股的 50% 以上，逐步减少到 18.22%。（21：06：47）股权改革意味着格力电器产权的民有化。与此同时，经营管理和劳动用工制度也逐步市场化。这是同国有的垄断性质格格不入的（格力集团由国资委全资控股）。于是就有了周少强空降格力集团和染指格力电器，并且命令朱江洪退休的异常现象。拒绝接纳周少强为董事后，股东大会选举董明珠为格力电器董事长。（21：26：47）格力电器的新格局虽然意味着民营对国有的胜利，但前景究竟是祸是福殊难逆料。在“朱董配”时期，两人性格迥异，一包容低调，一强硬霸气，但惺惺相惜，珠联璧合。现在朱江洪被迫退下来了，董明珠独挑大梁。她表示“我从来就没有失误过，我从不认错，我永远是对的。”这样自负的人，很少有不跌交的。（21：46：45）

2010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新 36 条”后，积极响应者甚少。温家宝在年初下了死命令：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细则制定出来。发改委 2 月 21 日召集 45 个部门开会，要有关部门在 6 月 30 前出台实施细则。现在，实施细则都出来了，但多数缺乏可操作性，有的毫无新意，很少有所突破。这反映了垄断集团对改革的顽固抗拒。（2012/7/13—20：28：20）2005 年和 2010 年的两个“36 条”，是反垄断的改革力量对垄断经济的进击，但发布后都遭到代表垄断利益的权贵集团的抗拒抵制。两个 36 条是现时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七年来虽然有所进展，但民营企业却面临“玻璃门”、“弹簧门”的嘲弄，困难重重。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主帅的温家宝也无可奈何。（20：51：03）

国家发改委官员不久前谈到，各部委为贯彻“新 36 条”而制定出

台了 42 个相关细则，“但与社会上迫切要求改善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环境的热切期望相比，确实存在一定差距。”掀开官样文章的背后，42 个细则里有多少是保障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的？又有多少是阻挡民营企业进入的？改革反改革、垄断反垄断的斗争，在这里呈现出赤裸裸的形态。（2012/8/24—21：11）

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应该是加强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冲击，两个“36 条”已经为这场新的战役准备了政策条件。（这是对一条微博的回应）（2012/9/3—20：52）

房地产调控

香港《商报》5 日以六个版的篇幅，发表该报《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其中特别强调对地产楼市的调控宜疏不宜堵，宜缓不宜急；过急过猛的调控手段，可能导致楼市硬着陆，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我读着这些论调，仿佛回到了一年多以前，当时一些房地产商豢养的文人对调控发出不祥的警告，现在怎么又老调重弹了？（2012/6/17—20：48：24）老调重弹的背景是：今年三四月许多城市采取微调政策，五月份楼市全面回暖；放松货币信贷和提出稳增长，似乎预示放松调控的可能。于是就有人出来鼓噪“硬着陆”之类的危言，动摇中央政府的调控决心。一年多的调控，抑制了楼市疯涨的势头，但使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的目标远未实现，放松调控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21：15：53）本月 5 日，住建部在新华网发布信息，强调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表示了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对房地产的调控，本质上是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激烈对抗。迄今为止，反垄断的改革力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抑制房价关联到千家万户民众的切身利益，却损害权贵豪强的既得利益，这是他们反调控的主要根由。（21：31：52）

26 日，河南六个部门联合发布文件，对购买首套房产者，金融机构可在 30% 幅度内下浮基准利率。但一天之后，省政府网站就删掉了这个文件，有关负责人说是误传。进入 2012 年后，类似事件在各地不断上演，说明有些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地要突破国务院的调控。这正是房地产领域垄断反垄断的反映。（2012/6/29—21：06：09）

近来，关于房地产销售量价同时止跌回升的报道和论述甚嚣尘上，人心惶惶。温家宝 7 日在江苏常州调研时强调，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仍然处在关键时刻，调控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调控工作。温家宝决心可嘉，但房地产权贵豪强的对抗没有减弱。垄断反垄断博弈的胜负如何，前景实在令人担心。（2012/7/9—20：18：33）

据今天的《北京参考》报道，北京海淀区的万柳地块，已被中赫置地集团以 26.3 亿元拍得，楼面地价每平方米超过 4 万。地价这么高，房价可想而知。我认为，控制房价必先控制地价。有人认为，房价应让市场支配，政府不应控制。但土地为国家所有，要卖多少钱，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有权确定，这是符合市场规则的。（2012/7/11—20：17：55）通过拍卖地块抬高地价，是地方官僚和地产豪强相互勾结，获取暴利的表现，是地产垄断的基本形式。高房价正是这种垄断的产物。更何况它涉及民生，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政府有责任出而干预，加以调控，以维持房地产业的市场秩序。所以，压低地价不但不违反市场规律，相反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20：29：42）（一跟帖认为，“压低地价，只能让开发商更暴利！”我作了以下回应）压低地价，才能抑制房价。比如，可以通过《反暴利法》，限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垄断企业暴利。暴利本质上是对老百姓的剥削。不论是从保护民生出发还是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反暴利都是必要的。（2012/7/12—9：55：4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报告，在 70 个大中城市里，有 25 个城市 6 月份房价环比上涨，而 5 月份环比上涨的只有 6 个城市。虽然涨幅均未超过 0.6%，但这趋势值得注意，说明调控任务还十分艰巨。其实调控手段远未用尽，如可用税收来控制购房，对买别墅或第二三四套房产者实行累进税，别墅越大，买房越多，税率越高。（2012/7/19—20：56：32）

国土资源部昨天召开视频会议，就《关于进一步严格房地产用地管理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紧急通知》进行通报，强调各地要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得擅自调整放松要求。看来，这场垄断反垄断的博弈已进入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从紧急通知可知，房地

产市场的量价双回暖，已引起决策者的高度警惕。（2012/7/20—20：29：48）一年多来，通过艰巨复杂的调控，遏止了房价上涨的势头，这反映了调控的成果；但房价没有回归到合理的水平，意味着垄断势力抗拒调控的胜利。《紧急通知》的发布，能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里抑制房价上涨的趋势？前景不容乐观。（20：36：30）

国务院最近派出 8 个督导组，对 16 个省市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看来温家宝着实是急了。调控的招数似乎已经用完，房价却开始反弹，他怎么能不着急？其实，要做到“房价合理回归”，不是没有狠招。第一个狠招是限制地价，例如每平米不得超过一千元，地价限住了，房价必然回落。（2012/7/27—20：57：31）地价大幅度下降，将极大地损害地方诸侯的利益。他们欠了 10 万亿的债，都指望靠卖地还债，自己还可捞一笔，所以一定会顽强反抗。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可考虑第二狠招，对超出生活需要之房产及别墅的购买者，收取高额累进税，如买第二套房及占地 400 平米以上的别墅（包括绿地），须交房价 5% 的房产交易税；（21：21：06）买第三套及占地 500 平米以上的别墅，须交房价 10% 的交易税；买第四套及占地 600 平米以上的别墅，须交房价 15% 的交易税。以此类推。这一方面限制了房地产的投机和“别墅热”，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开辟了财源。对于买房者来说，你既然要享受超过民众平均水平的房产，就应该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21：37：0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开会，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9 项要求，有一条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切实防止房价反弹，增加普通商品房特别是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满足居民合理的自住性住房需求。”调控形势仍很严峻。（2012/7/31—21：05：21）

报载国务院派出检查房地产调控政策贯彻情况的 8 个督察组已经回京复命，据他们汇报，各地高度重视对房地产的调控工作，政策措施落实较好；发现一些问题，已经向有关政府提出整改意见。看来总的情况还好，虽然其中难免会有水分，但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还是可以令人欣慰的。（2012/8/18—20：43）自从国务院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

控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豪强及他们的帮闲就没少嚷嚷，说调控违反市场规律。这叫“贼喊捉贼”。房地产业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垄断行业，一是官商勾结，二是垄断资源（土地），三是垄断价格，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国务院对它实行调控，正是为了遏止垄断，使它向市场规律靠拢，回归市场经济。（20：59）

对房地产的调控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了，其实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限制地价，以限制地价来限制房价，如规定房价不能超过地价的多少倍，既让房地产商有钱可赚，又不能获取暴利。（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2012/8/22—21：24）

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又在鼓吹房价要涨、赶快买房。这个房地产豪强的吹鼓手总不忘在关键时刻为他的主子呐喊！（2012/9/18—20：18）

读报随感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土家语传承实验教学项目，在永顺县的十年一贯制学校里，开办土家语教学试验班，并把土家民族文化活动引进学校。这是大好事。长期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缺乏应有的重视，怀着大汉族心态去处理民族问题，使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濒临灭绝。湘西的做法值得称赞。（2012/6/10—20：20：37）

18日《人民日报》一文章介绍，西部某县推行土地流转，把农民土地集中到中介组织，转租给龙头企业或承包大户。这些承租者盖起大棚，或转租给村干部，每年每亩利润达4万至20万元，农民得到的租金每亩却只有几百元。土地流转成了地方权贵勾结豪强剥夺农民的新形式，这是政治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又一恶果。（2012/6/20—20：48：27）（此条微博后有一跟帖认为，土地集中是个好现象，只有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才能提高农业经济效率，于是我有下面的回应）要使土地集中成为“好现象”，首要条件是农民作为生产资料即土地的主人进入新兴产业，并占有产权。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掠夺土地的权贵豪强每亩一年可赚十来万，农民却只能拿几百元。（2012/6/21—21：46：34）

工信部长苗圩在成都的“财富论坛”上说，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提

供了约占全国 65%的发明专利，75%的企业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主力军。这些数据证明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因为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它为我提出的民营经济应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2012/6/23—20：55：25）

温家宝最近访问拉美四国，26 日在圣地亚哥发表演讲，倡议成立中拉合作论坛；发起设立中拉合作基金；建立产业合作机制；成立中拉农业部长论坛和农业科技研究中心，建设农业加工示范园、农业投资开发区；建立中拉科技创新论坛。此外，还同智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研究建立自由贸易区。（2012/6/29—20：19：43）近来有些朋友为美国扩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而愤愤不平。其实，历史是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国家提供广阔的舞台，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美国可以把手伸进东南亚，我们也可以进军他们的后院拉丁美洲。温家宝这次访问拉美，成果丰硕，是中国外交的大手笔，其成果远远超过美国在东南亚扩大部署的影响。（2012/6/29—20：47：58）

报载河北有一农妇，四五十年前刚嫁到夫家时生活困难，邻居帮她盖房子，还凑了 400 元钱给她，此后又继续帮助她。后来她从捡垃圾开始，办了废品收购站，积累了上百万的资财。她不忘当年乡亲的恩情，不断掏钱为村民做好事，至今已付出 150 万多元。在人情淡漠的今天，这种感恩的观念和行为都值得大力弘扬。（2012/7/1—20：39：41）感恩是人性的重要内涵，也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古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大处说，我们每个人从诞生时起，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无不处在他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之下。因此，天然地具有回报社会和他人的义务。感恩，是每个社会成员必备的品德，大家都有感恩精神，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稳定。（2012/7/1—21：01：09）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被教育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似乎其他的人和事都不值得感谢。这就完全扭曲了感恩的原有精神。毛派宣传毛泽东时代如何美好，提倡回到毛泽东时代。其实，毛泽东时代是信仰和人性被扭曲的时代。人们一旦发现这个真相，就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所以毛泽东时代是永远也不可能复制的。2012/7/1—21：19：

26)

教育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立英本月2日到上海财经大学，宣布教育部关于任命该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及免去原任党委书记和校长职务的决定。此人同一天还到华东师大宣布教育部任命该校校长的决定。大学校长的任免由教育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来宣布，看了总有点滑稽的感觉，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党的领导”吧。（2012/7/4—20：35：34）

教育部和广东人民政府、李嘉诚基金会最近签署关于共建汕头大学的协议，支持汕头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发挥教育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广东省教育厅长罗伟其说：“这等于让汕头大学享受‘部级待遇’。”大学有部级、厅级的不同待遇，反映了教育官僚化的深度。西南联大什么待遇也没有，培养了多少人才！（2012/7/4—20：58：15）

报载北京大学校级领导人竟有27人，仅校长助理就有11人。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据校方解释：“这在北大是常态。”（见于昨天《北京晚报》）一百多年来的北大，什么时候官僚成群竟成了常态？有这个必要吗？例如，党办校办主任的份内工作，就是协助校长，何必兼任校长助理？多么严重的衙门化！（2012/7/6—20：48：41）

报载内地申报香港12所高校的人数甚多，仅报名香港大学者就有31个省市的12438人（拟录取363人），包括21名省市高考状元；科技大学报名者为录取数的44倍。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纷纷去香港上学，内地的大学校长们不感到惭愧吗？（2012/7/16—21:17:26）

报载钱宁先生重编《论语》，按内容编排，未增删一字一句，书名《新论语》，已由三联出版。《论语》原为弟子根据孔子授课辑录下来，成书时未经妥善编辑，比较凌乱。《新论语》把相同的内容编在一起，便于人们学习了解、查考引用孔子学说。钱宁说这是他“对《论语》做出创造性解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2012/7/5—20：36：42）

我赞成钱宁关于创造性解读的说法。对于历史上有影响的经典著作，都应该进行创造性解读。当代最需要解读的，恐怕莫过于马克思主义。肯定者奉为神圣，否定者视如粪土，甚至认为它是当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总根源。认真解读非常必要。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他少年时代是虔诚的基督教徒，（2012/7/5—20：50：43）青

年时代是狂热的人道主义者，接着，经由异化理论成为共产主义者，晚年转为科学社会主义者。这四个思想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是有是非，后者既是对前者的否定，也是对前者的继承，因此，每一阶段都留有前者的痕迹。他最后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既含有新教精神、人道主义，也有主张暴力革命的（21：16：02）共产主义残余。要深刻而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就需要钱宁所说的“创造性解读”，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来加以考察，了解他一生思想的接续和变化，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21：21：44）

香港《南华早报》8日的一篇文章谈到，根据对上海一些中小学生的调查，有60%以上不会说上海话，这使我大为惊讶，联想到前不久发生的广东话与普通话之争，感到我们不能再忽视地区方言的保护问题了。各个地区的方言，不仅体现着这个地区的文化，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例如我老家的温岭方言，（2012/7/10—20：28：00）就有许多在普通话里已经消失的音韵。有些古诗词，按普通话读似乎有些走韵，用温岭话来读就很悦耳。这就说明温岭话保持的，不仅是温岭文化，而且有古代中原的文化。这个现象可以提供很多研究内容。听说在广东福建，也有这类情况。方言可说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方言消失了，有关的文化也就湮没了。（20：45：46）有些地方为了推广普通话，规定不许在学校、商店讲地方话，这很不应该。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听说连本民族的文字也受到限制，有些中小学甚至取消教授当地文字的课程。这就不仅是个文化问题了。这些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诸侯，仗着一党专政的无限权力，在民族地区作威作福，总有一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21:00:50）

从报上得知，在这次北京水灾中，有几位基层干部因救援灾民而献出生命，包括房山韩林河镇副镇长高大辉，燕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所长李方洪，密云大城子镇镇长李建民，良乡给水厂给水队长郭云峰。他们的牺牲，使我们看到了基层干部关注民生、奋不顾身的一面，真正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2012/7/25—20：31：12）

从《深圳特区报》上读到新华社2日电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一句微博‘孔和尚出门看热闹，喜看首都成泽国’，因为其无耻地幸灾乐祸，招来网民骂声一片。”人们都为不幸的死伤者哀戚，这

个以孔子后裔自居的人却在高兴地看热闹。我虽然早就不耻其人，但还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会毫无心肝到这种程度。(2012/7/25—20:48:03)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紧急部署“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坚决查缴非法出版物”。一场新的“焚书运动”已迫在眉睫。其实这些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包括在香港出版和自费印刷的，都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精品，真正“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这个自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组织却要查缴它，这是多么大的讽刺！(2012/8/16—20:40 据今天《人民日报》报道，开展这次“扫黄打非”专项行动，是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实在太离谱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要召开代表大会，却要依靠查缴当代最优秀的著作，来“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使我想起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文革时期对祖国文化的大破坏。奉劝这些文化专制主义的操刀手们，积点德吧！(20: 54) 这次“扫黄打非”的重点是查缴“非法出版物”，包括香港出版的书，例如我的《回归民主》。奇怪：在香港正式出版的书，到了大陆却成了“非法出版物”，难道这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吗？据说两制指的是：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自由，现在却还不如香港自由，说明大陆的制度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专制制度。(2012/8/17—19: 58) 我的《回归民主》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后，大陆立即查禁，邮局拒绝收寄。幸而我还有自己印的简体字版《评“八确立”、“五不搞”》，与《回归民主》内容完全一样，给一些朋友就寄这个版本。虽然装帧太简陋，但朋友们也还十分欢迎。想起俗话“东方不亮西方亮”，“人不能叫尿憋死”，确实很有道理。(20: 13)

今天的《参考消息》刊登该报记者“特别报道”，介绍朝鲜罗先经济特区经济如何活跃，市场如何繁荣，鼓吹外国大力投资。最近一期《民营经济内参》则介绍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2007 年投资2.4亿元，与朝鲜一企业合资开采铁矿。2011 年选矿厂投产不久，朝方就撕毁合同，甚至把中方的10 名员工驱逐出境，75%的股权血本无归。这种强盗行为可为投资者鉴。(2012/8/28—20: 58)

国务院今天的常务会议决定取消或调整 314 项部门行政审批项

目，并且提出“阳光审批”。应该承认这个措施的进步意义。许多繁琐的行政审批项目，害苦了民营企业，养肥了官僚机构。撤消不必要的审批项目，保留下来的则实行“阳光审批”，完全符合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希望这个决定能够很好贯彻，不要再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圈。（2012/8/22—20：38）

读几则报道，似乎又听到大跃进的脚步声。广东宣布为重点海洋项目投资 1 万亿元，重庆以 1.5 万亿元投入产业三年振兴规划，天津要在四年内投入 1.5 万亿元，武汉投资 500 亿元于“楚河汉街”项目，长沙今年重点项目预算 400 亿元，贵州甚至要投资 3 万亿元建设生态旅游和国家公园，而去年全省财政收入才 1330 亿元。钱从哪里来？搜刮老百姓，沈阳罢市就是危险讯号。（2012/8/28—21：22）

近来，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我国的官方舆论在报道这个问题时，往往偏向伊朗。其实，以色列总理之所以多次说要摧毁伊朗核设施，是因为内贾德和哈梅内依都否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再三威胁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如果他们有了核武器，以色列不就危在旦夕了吗？我国应积极参加限制伊朗核能的发展，使中东避免新的悲剧，不能袖手旁观。（2012/9/4—20：46）

继陕西省纪委宣布对该省安监局长杨达才进行深入调查之后，广州越秀区武装部政委方大国也于 2 日被停职检查。最近发生的这两起事件，是由于网络和微博的揭发和“人肉搜索”，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网络作用大矣哉！特别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也介入方大国事件，意味着体制内外舆论的联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值得重视。（2012/9/7—21：48）

《深圳特区报》今天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介绍“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第一人”黄闻云。她十多年前为建设国家信用体系奔走呼号，个人出资 30 多万元派专家到欧美考察，四次上书朱熔基，为信用事业作出贡献。信用体系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关键。信用体系的建立，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黄闻云功不可没。（2012/9/9—20：54）

报载上海胡润研究院发布 1000 名富豪的排行榜，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的富豪，6 年前只有 15 人，目前已经增加到 251 人。财富积聚的

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达到人们难以想像的地步。对于这些财富的来源，是否有必要加以审计？其中有多少是合法收入，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地掠夺老百姓的，有多少是变相侵吞国家的？（2012/9/27—20：33：03）

反右 55 周年

香港五七学社和中文大学在 6 月 10 日联合召开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研讨会，而发生反右运动的大陆却被禁止开会写文章。这个做法十分愚蠢。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了的，真理更是抹杀不了的。愚民政策没有出路！只有取消舆论导向和会议禁令，让大家了解反右运动真相，从中寻求真理，才能接受教训，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2012/7/3—21：13：30）

我在 6 月 8 日邀请几位朋友茶叙，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有一位朋友因收到香港 10 日纪念会的邀请信，连日被国安骚扰，不许他到香港参加会议，并严密监控。8 日他说要去看望朋友，国安说我们派车送你去。为了不连累茶叙的朋友，他谎报了目的地，下车后摆脱盯梢，搭公共汽车前来。这个插曲，为茶叙增添了谈资笑料。（2012/7/3——21：32：36）

有的朋友很不赞成把当年右派子女称为“右二代”，认为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都有讽刺和贬斥意味，仿佛都是一些仗恃父母权力财富的纨绔子弟。而我们父母当年因为反专制争民主而被打成右派，但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光荣的，我们引以为豪。不能让“右二代”这个称呼玷污了我们。（2011/7/8—21：15：53）右派子女是不幸的、平庸的一代，同时也是大有作为、大有希望的一代。他们青少年时代成长在贱民家庭，被剥夺了应有的社会资源，缺乏良好教育，因而学问和见识都不如 55 年前的父母辈。但是，网络时代的信息涌流，民间民主运动的持续高涨，却使他们获得了父母辈所不具备的条件。可能比他们的父母作出更大的贡献。（21：28：44）

有一位五七难友“改正”后在某县政协工作。前几年该县举办画展，他画了一幅上有红日高照、下有三座山峰的国画。展出时颇多好评，初评二等奖。复评时发现此画作者是他，竟然说此画有政治问题，

“三把小刀指向红太阳”，说他“右派分子不老实”，是“右派劣根性”，不但取消二等奖，而且不许展出。呜呼！毛毒何其烈，至今仍嚣张！（2012/9/6—20：57）

新“黑五类”

近来关于新“黑五类”的讨论颇为热闹。不论这位袁鹏所长出于什么动机，为了取悦于权贵也好，炫耀自己的毛左立场也好，他都搅动了一些人的思绪，提供了一点谈话的资料。有点无聊，也有一点意思。作为曾经是老黑五类的贱民，本不想跟他瞎掰，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心思。但这位袁大人把我也圈进新黑五类了，让我“二进宫”，使我无法保持沉默。（2012/8/12—20：52）袁所长说“维教异网弱”（杜按：指维权律师、家庭教会、异见人士、网络精英、弱势群体）这五种人被美国利用来阻止中国崛起。这就奇怪了，你们不是早就在大肆宣传崛起的“中国模式”了吗？怎么又说我们被美国用来阻止中国崛起呢？我们什么时候成了中国崛起的障碍了？新“黑五类”都是公民权利被侵夺的受害者，有些人长期被监视、跟踪、拘留甚至判刑入狱，起而抗争，有什么错？怎么就阻止你崛起了？（21：07）崛起，应该是堂堂正正地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化的大国崛起，只靠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内却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把大量甚至是多数的黎民百姓当作危险因素，时刻防范、压制，这样，即使崛起，也只能是短暂的、表面的崛起，孤立的崛起。近几年来，几乎所有邻国都对我们保持距离，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21：22）袁所长把一部分公民划出来示众，拾的是老毛的余唾。老毛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就是是为了收拾他看不顺眼的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结果不但胡风、右派成了敌人，连彭德怀、刘少奇都当成敌人来消灭，你说这一招多厉害！袁所长推出新“黑五类”，不知意欲何为？

（2012/8/13—20：17）维权律师被列为新“黑五类”之首，成了“黑老大”，可谓名至实归。他们是最让专制统治者头疼的人。每年十余万起的群发性事件，只要维权律师介入，权贵豪强就慄头。这些“黑老大”精通法律，一方面把维权民众引上合法的轨道，同时向那些侵权者据法力争，把维权民众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等于堵了权贵豪强的

财路，或是挖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受得了吗？（2012/8/13—20：36）其实，维权律师是当代最进步的精英群体。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改革、维权、启蒙中，维权运动是最明显、最直接，也是最广泛、最尖锐的革命形式，短兵相接，高潮迭起。维权律师由于熟谙法律，最善于直捣专制统治者的软肋，最有资格成为这种革命形式的指挥者，所以也最为权贵豪强所痛恨。向新“黑五类”的“黑老大”致敬！（20：56）

权贵豪强相互勾结的拆迁暴行，正在制造着无数新“黑五类”。（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2012/8/25—20：43）

王薄事件

谷开来被判死缓，这个案件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这个案子留下太多的疑点，使人对薄王两案是否能够如实依法审判缺乏信心。老百姓要关心政治，但政治的真相总是被蒙在鼓里，让人们怎么关心？也许，他们的本意就是不让你关心。（2012/8/20—20：57）

自从王薄事件出来后，毛左派的声誉一落千丈，钓鱼岛事件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翻身的大好机会。他们利用各地保卫钓鱼岛主权的游行，打出标语口号和毛泽东画像，蛊惑民众。韩德强打了一位老人两个耳光，泄露了这里面的秘密，原来那几百名示威者是从河北固安拉来的，给外界造成的印象，这是北京民意的表现。用河北农民来冒充北京民意，是否太卑劣了？（2012/9/22—20：48）

网上有人介绍张宏良支持韩德强的微博，他提出质问，难道“没有信仰毛主席的自由”？真是胡搅蛮缠，谁干涉你们“信仰毛主席的自由”了？被韩德强打了两个耳光的老人干涉了吗？难道别人就不能有“不信仰毛主席的自由”吗？老人只是“不信仰毛主席”，就被韩德强打耳光，被诬蔑为汉奸，这不是用暴力剥夺老人的“不信仰毛主席的自由”吗？这就是毛左派！（2012/9/23—20：41）

两个巴掌打出了毛左派的凶残本相，一声汉奸暴露出毛左派的丑恶用心。（这是对一条微博的回应）（2012/9/25—21：05：59）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打人，骂人，说别人是汉奸卖国贼，已经成

了毛左派的专利和特权。只要是骂别人是汉奸或卖国贼的，不用细问，准是毛左派。(2012/9/28—20: 52: 55)

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将移送司法机关，人心大快。虽然晚了一点，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现在就看下一步了。希望下一场少一点遮遮掩掩，多一点法治阳光(2012/9/28—21: 04: 18)双开除的决定，粉碎了毛左派的幻想。他们的神像崩塌了，假象剥掉了。薄熙来的一巴掌开其端，韩德强的两巴掌继其后，巴掌之用大矣哉！

(21: 43: 26)王立军干尽了坏事，但最后立了大功，判处 15 年还是可以的。作为罪魁祸首的薄熙来，判刑总不该比王立军轻吧！(21: 48: 49)本来大家以为可能在 10 月召开的十八大，现已定在 11 月 8 日举行。这说明薄熙来的罪案还没有最后敲定，这从公布双开信息的报道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难道查了几个月还没有查清吗？不是没有查清，而是没有确定哪些入罪，哪些掩盖下来，这些还在拉锯博弈之中。(20: 46: 37)

中国工人（共产）党不久前发表该党主席齐志平署名的致中共中央的“中工建字第 45 号建议函”，提出“恢复薄熙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增补为十八大代表”。作为毛左派的中坚力量，这个党几个月来一直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现在薄已被双开，不知道他们还会玩出什么花样出来。(2012/9/29—20: 29: 45)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附 1: 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一 <http://tiny.cc/meyarw>

附 2: 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二 <http://vur.me/jwnews/jw/>

附 3: 网址三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